

第三章 帝域與異域：1920 年代佐藤春夫的南方體驗

前言

佐藤春夫到台灣旅行的時間，是在 1920 年（大正 9）6 月底至 10 月中旬，這不但是他生命中唯一的台灣之旅，也是有生以來首次的遠行。在這次的旅行期間，他還跨海到中國福建廈門遊覽兩個星期。在抵達台灣後，佐藤春夫認識了影響他此趟旅行的重要人物森丑之助，一位人格氣質皆令他相當讚賞的人類學者。森丑之助當時任職台北博物館長，他對佐藤春夫釋出極大的善意，親自寫信建議旅台行程，包括到福建廈門也出自他的推介。也由於森丑之助的引薦，佐藤春夫在滯留期間受到當時台灣民政長官下村宏派令的特別照顧，沿途各地獲得盛情招待。另一方面，相較於台灣方面的諸多優勢，佐藤春夫在旅行中國期間卻由於語言隔閡以及文化落差，甚至是隨行嚮導的疏忽，則讓他明顯感受客居異鄉的寂寥與不安。

1920 年的閩台之旅，應該讓佐藤春夫觀察到東亞正在轉變，不僅是日本，此刻的台灣與中國已然呈現具有差異性的文化內涵。台灣在當時已經接受日本統治達四分之一世紀，從淪為殖民地之後，台灣人的文化認同縱使出現兩難的抉擇，但是相當明顯的，台灣社會正快速邁向文明化與現代化。至於對岸中國的廣東沿岸一帶，卻是粵桂兩軍開戰的前夕¹，國內到處動盪不安，籠罩著人心惶惶的氣氛。兩岸的政治局勢與社會民情，誠然有著極大的不同，也影響旅者的心情。從而，在兩地旅行的差別環境下，他往往在回憶文字中肯定台灣旅行的成功。佐藤春夫自己也曾說過，殖民地之旅是促使他更亟欲深入瞭解「南方」而到南洋群島從軍的契機。

佐藤在返回日本後，從 1921 年到 1937 年之間，陸續發表了多篇與閩台旅行相關的作品，體裁包括了小說、遊記與散文。這些文章的取材，多半來自實際的旅行體驗，具有紀行文的性質。透過這些文字不難發現，佐藤筆下的台灣與福建，有著相當殊異的風情，而作者對於兩地的文化觀感亦頗有差距。當時森丑之助所重點推薦的，是台灣山地與原住民部落，他所安排的殖民地行程，可以說是一種博物館學式的導覽。因此，佐藤春夫的殖民地書寫，也側重在山地原住民的刻劃，

¹ 佐藤春夫到中國所遇到的是「第一次粵桂戰爭」，又稱「兩廣戰爭」。是舊桂系軍閥陸榮廷，與效忠孫中山、由陳炯明所指揮的粵軍，在 1920 年至 1921 年之間爆發的一場戰爭。主要作戰的地域為廣東，廣西兩省。

流露出日本人的「蕃人」觀。另一方面作者對南方抱有憧憬，嚮往原始與自然的情懷隨處可見。而他對於福建的描繪，則聚焦在民族的頹廢面，不論是廈門街景或是人物，作品漫漶一種腐敗、衰退的氣味，不過，也有淒美的描寫如「章美雪女士之墓」，他更屢次把焦點放在純粹的風景之上，相當欣賞當地的旖旎山水。誠然，佐藤春夫的書寫方式，傾向是選擇性地展示台灣與中國，這是一種旅行者抽樣性的文化觀察，不過其中所凸顯的文化位階亦是頗為鮮明。

台灣在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也作為日本人想像「南方」的實景，在旅行的跨文化想像之下，佐藤春夫的台灣書寫其實蘊含現代性與殖民性的帝國視域。他聚焦於描寫熱帶的南方風情、原始的原住民人種、傾頹荒廢的建築殘址，帶有強烈的異國情調。憑藉佐藤春夫在日本文壇的知名度，他的台灣相關作品不僅開啟許多日本人的殖民地想像，也引發當時後輩作家的南方憧憬，甚至成為日本人作家的台灣書寫之典範。1920年的台閩之旅，也是他南方體驗的起步。可以說，他的東亞探索是以台灣和中國作為開端，然後逐漸向南方前進。對中國古典文學相當孺慕的佐藤春夫，受到初次旅行時的動亂影響，他的中國印象應該也受到衝擊，在《南方紀行：廈門採訪冊》已經可以看出一些徵兆。佐藤春夫後來又三度前往中國，在中日戰爭期間是以隨軍作家身分成行，也曾經在1943年跟隨日軍遠赴馬來半島、爪哇等地。重新檢視他的閩台書寫，他的東亞觀察顯然具有繁複的隱喻。

從大正時期以降，詮釋台灣不再只限於人類學者或殖民地官吏，這個島嶼也逐漸吸引日籍作家的到訪。透過佐藤春夫的閩台相關作品，不難看出台灣有曖昧的隱喻，既是自然豐腴也是文明未熟的土地。佐藤春夫的南方觀，顯然與日本所逐漸展開的南進政策與東亞論述有所牽涉，以他的文學影響力，也極有可能發展為日本人想像東亞的一個範本。因此本章將以佐藤春夫的台閩紀行為主題，藉此檢驗近代旅者的殖民地體驗與跨文化想像。不難看出，自竹越與三郎、中村古峽以降到佐藤春夫的南方書寫，次第勾勒出一條認識台灣的系譜，這條系譜的生成背景，顯然涉及了帝國的慾望，並且和日本漸進演變的南進論有密切關係。佐藤春夫在台閩紀行中對兩地的文化詮釋，帶有強烈的現代性批判眼光，不僅能夠窺探出他最初的南方印象，也可側面理解他後來在戰爭期(1937-1945)的文學立場。

第一節 殖民地的隱喻：佐藤春夫的台灣旅行書寫

一、引言：博物館學的觀看

佐藤春夫是日本來台作家中，建立旅行文學的擘建者²。日本學者島田謹二（1901-1993）的研究指出，日據時期以台灣為取材對象的散文作品，亦即內地作家的台灣紀行，當以佐藤春夫（1892-1964）的《霧社》為第一位³。佐藤春夫終生只來過台灣一次，他旅台的時間是1920年（大正9）年6月底至10月中旬。由於此行受到官方的款待，佐藤春夫得以暢遊台灣各地。在返回日本後，從1921年（大正10）到1937年（昭和12）之間，他陸續發表了十二篇與這次旅行相關的作品，體裁包括了小說、遊記與散文。這些文章的取材，多半來自佐藤春夫的旅行體驗，具有紀行文的性質。通過作品可以發現，作者的足跡遍及台灣南北，甚至跋涉到高山地帶。其中，〈社寮島旅情記〉與〈天上聖母〉是描繪基隆社寮

² 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詳見本節附錄之表一：「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目錄」，本文引用這些文章時請參考此表，文中將不再註明原發表刊物與日期（只列中譯本頁數）。從1921年（大正10）開始，佐藤春夫陸續將這些作品發表於日本的雜誌上。並在1926年（大正15），發行了單行本《女誠扇綺譚》（東京：第一書房）。後來在1936年（昭和11）結集出版了《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年（昭和11）7月發行），共收入六篇作品：〈日章旗の下に〉（太陽旗之下）、〈女誠扇綺譚〉（女誠扇綺譚）、〈旅びと〉（旅人）、〈霧社〉（霧社）、〈殖民地の旅〉（殖民地之旅）、〈かの一夏の記〉（彼夏之記，本篇為作者取代跋文的作品）。台灣學者邱若山已將上述之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翻譯完成並出版，請參閱佐藤春夫著，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文化，2002年9月。但是這本中譯本《殖民地之旅》所收入的第一篇作品〈星〉，是中國的民間故事。〈星〉（《改造》，1921年3月）是佐藤春夫在台灣旅行中途，轉往中國的福建與廈門參觀時，在廈門的客棧透過一位台灣人轉述給他聽的中國地方性傳說，故事紙本為清朝的小說《荔鏡傳》。這個傳說當時也流傳到台灣，成為民間很受歡迎的戲劇「陳三五娘」。然而〈星〉的內容，雖然源自於《荔鏡傳》的靈感，內容卻和《荔鏡傳》不盡相同。佐藤春夫自己也說過：〈星〉是他個人的創作（參見佐藤春夫，〈詩文半世紀〉，收入佐伯彰一、松本健一監修，《作家の自傳12 佐藤春夫》，東京都：日本図書センタ，1994年10月初版，頁282。）換句話說，〈星〉是取材自中國泉州的故事，和佐藤春夫後來發表的〈南方紀行〉（《新潮》，1921年8-10月）同屬於中國相關作品系列。因此，筆者在「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目錄」中並未將〈星〉收入。

³ 關於島田謹二對《霧社》的評價，請參閱氏著，〈台湾に取材せる写生文作家〉，《華麗島文學志》，東京：明治書院，1995年，頁255。在佐藤春夫之前已有許多日人畫家的台灣旅行觀察文字（請參閱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台北：雄獅美術，2001）法國文學，也是官方文藝政策的主導者之一。島田謹二將法國的殖民地文學（littérature coloniale）的概念介紹到台灣，提出了「外地文學」的論點。他以日本／內地為座標，將殖民地台灣的文學命名為外地文學。外地文學論是島田謹二為了與日本東京文壇的內地文學一別苗頭，而針對台灣的日人作家所提出的文學理論。有關島田謹二的相關研究，將於本論文第五章中探討。另外，可以參考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清大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年。

島媽祖廟的見聞。〈女誠扇綺譚〉與〈鷹爪花〉，以台南的廢屋、鳳山的尼姑庵為場景；〈殖民地之旅〉則是探討和中部文化界人士的會面情況。除了上述各篇之外，其餘作品則和「蕃地」旅行有關。這些文本為讀者烙下鮮明的印象。在這趟台灣行旅中，作者相當偏愛島嶼南部與原始部落的異國風情。他的殖民地體驗與旅行書寫，也具體呈現出內心的台灣風景。

憑藉佐藤春夫在日本文壇的知名度，他的台灣相關作品不僅開啟許多日人的殖民地想像，也引發當時後輩作家的南方憧憬，甚至成為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之典範⁴。然而，根據佐藤春夫的說法，他來台的契機可說是相當偶然的⁵。1920年（大正9）的夏天，為了排遣個人感情生活所帶來的鬱悶情結，他從東京回到故鄉，無意間在街上和中學時代的好友東熙市相逢。東熙市在台灣高雄開設齒科醫院，為了籌設翻新醫院的費用而回到日本的家鄉。東熙市和他碰面後，極力慫恿他來台，佐藤春夫終於決定到台灣旅行。他們於六月底出發，在基隆下船前往台北後，東熙市的首要之務，就是帶領佐藤春夫去拜訪擔任台北博物館代理館長的森丑之助（1877-1926）⁶。與森丑之助結識，可說是這趟旅行中的完美起點。透過他的引薦，佐藤春夫的旅程安排受到當時民政長官下村宏（1875-1957）派令的特別照顧⁷。誠然，東熙市是佐藤春夫訪台的推動者，但森丑之助才是這趟旅行

⁴ 佐藤春夫（1892-1964），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人。慶應大學中退。他是日本近代有名的詩人、小說家、評論家，與谷崎潤一郎、芥川龍之介同為大正時期相當活躍的作家。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佐藤春夫屬於耽美派作家，他的成名作是〈病める薔薇〉（《黑潮雜誌》，1916年（大正5）6月號）與〈都會の憂鬱〉（《婦女公論》，1922年（大正11）1月號）這兩篇作品。耽美派的代表人物如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作家，他們所推崇的耽美主義是一種浪漫主義。耽美派站在反對自然主義的立場，揚棄道德功利性而以美為至上追求的藝術傾向，特質在於強調世紀末的頹廢、耽美、官能的傾向。

⁵ 佐藤春夫，〈かの一夏の記〉（彼夏之記），收入單行本《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年（昭和11）7月發行；本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霧社》，（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台灣編〕5），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發行，頁253-254。

⁶ 森丑之助（1877-1926），日本京都市人。1895年（明治28）以陸軍通譯的身分來到台灣，在他隨軍隊移防台灣各地的同時，他開始接觸台灣的原住民社會，引發他研究台灣「蕃地」與「蕃人」的興趣。1896年（明治29），森丑之助結識正在台灣東部進行調查的鳥居龍藏（1870-1953，日本德島縣人，著名的日本人類學家，共來台四次進行原住民族的學術性調查旅行），爾後成為鳥居龍藏在台的助手、翻譯與嚮導。1913年森丑之助暫時返日，於1914年又應台灣總督府之邀，來到台灣擔任蕃族科囑託。1926年7月由於工作、人際關係等諸事不順遂，在坐船返日途中投海自殺，享年49歲。關於森丑之助在台田野調查活動，可參閱森丑之助著，楊南郡譯，《生蕃行腳》，台北：遠流，2000年。

⁷ 下村宏（1875-1957），字海南，日本和歌山縣土族。在1915年（大正4）由第六任總督安東貞美聘請他到台灣擔任民政長官。任內廢除了小學教師制服佩劍的制度、違反人權的「罰金及笞刑處份例」，並且設立供台灣人升學的高等專門學校，以及規劃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至1921年（大正10）辭職為止，他歷經安東貞美、明石元二郎、田健治郎等三任總督，也建立了自由的作風。在台灣任職時，下村宏也得到法學博士的學位。除了政務官的身分外，他不僅擅長寫作短歌、隨筆，而且還是研究著作等身的學者作家。離開台灣回到日本後，下村宏進入新聞界服務，戰後則致力於日本體育的重建。關於下村宏在台的政績，可參考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東村山：教育社，1981年4月發行。中譯本為黃英哲譯，《台灣總督府》，台北：前衛，2002年5

的指標性人物。因為，佐藤春夫遊台的行程，完全出自森丑之助的規劃，包括到對岸中國的福建、廈門之旅，也是聽從他的建議而行。其中，森丑之助重點導覽的，就是台灣山地與原住民部落的參觀。以人類學的立場所安排的殖民地旅行，其實是一種博物館學式的導覽。

對殖民者來說，在島民的族群分布與文化層面上，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的認知最為薄弱。根據柯恩（Bernard Cohn）的研究，帝國主義在透過知識的權力運作去建構殖民地圖像時，各種針對殖民地的調查是最有力的操作工具⁸。總督府在接收台灣之初，為了瞭解「蕃人」的種族特性，統治當局陸續派遣了人類學者，積極投入台灣原住民的人種調查。對殖民者而言，調查模式中的歷史編纂與人類學研究，是建構原住民族群最具力量與權威的方式。而像人口與族群分布的統計報告，就可以透過行政的運用而發展成科學或經濟學研究的範疇。藉由一連串精細的數據與調查報告，總督府展開了理番政策與山區資源開發。森丑之助的人類學研究，也是促進帝國主義發展的一環。而他對佐藤春夫的旅行策劃，就是以博物館學的思維，選擇性的「展示」（exhibit）台灣。經過這樣的安排，佐藤的殖民地之旅，幾乎就是一次博物館之旅。

抵台後隨即和友人東熙市來到南部的佐藤春夫，由於當時台灣進入颱風季節的緣故，因此接受了森丑之助的提議，先轉赴中國的福建與廈門參訪。8月初從中國回台後，仍然以東熙市的家為據點，周遊高雄至台南一帶。這時，他再三收到森丑之助的來信，提到要讓佐藤春夫「在最短時日內看盡台灣該看的地方」（〈彼夏之記〉，頁344）⁹，並為他訂出一份旅遊計畫。森丑之助擬定的重點行程，是台灣中部山林與「蕃地」觀光。透過他所提供的旅行日程（預定）表，可以建構出這位人類學者印象中的台灣景點¹⁰。

二十世紀初大正時期的日本，經由媒體的策劃與宣傳，海外旅遊活動逐漸成

月修訂一版第五刷。

⁸ Bernard Cohn, "Introduction", in Bernard Cohn, *Colonialism and its Form of Knowled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6, pp.3-15. Bernard Cohn 在導論中探討了殖民主義擴張與它的知識型態，亦即大英帝國如何透過知識與權力運作去建構印度的殖民地圖像。Bernard Cohn 指出，相對於清晰、明確的歐洲地理，印度象徵了模糊、神秘的東方。古老的印度文明就像一個龐大的博物館，為了瞭解它的知識、文化，各種針對殖民地的調查方式也應運而生。所以，在地理上的印度，有旅行者的凝視；在人文上的印度，有人類學者和歷史學者的凝視；在社會上的印度，有警察的凝視；在民族上的印度，有帝國之眼的凝視。從而，印度被建構成帝國想像的東方，一個被貶抑的「他者」。大英帝國的殖民主義具體呈現了，印度的古老文明縱使淵源深遠，它依然可以被解剖分析，然後在帝國的啟蒙下，有如博物館的文物被典藏定位。

⁹ 佐藤春夫和森丑之助的互動，以及森丑之助對他旅台行程的提議，見於佐藤春夫，〈かの一夏の記〉（彼夏之記），《霧社》（復刻本），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發行。中譯本引用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文化，2002年9月初版。本文如再有引用中譯本部份，則只於引文後附上頁數。

¹⁰ 關於森丑之助為佐藤春夫所訂定的山地旅行計畫，請參閱本節附錄之表二：「森丑之助所提供的旅行日程（預定）表」。

為國民休閒生活的一部份。在統治台灣以後，殖民地也被形塑為日本國民旅行的新天地¹¹。台灣旅遊環境的制度化，一方面可以展現殖民者統治的現代化成果，另一方面也有促進殖民產業的考量。旅行觀光是促使日本人與全世界「觀看」日本殖民成功的管道，「蕃地」作為一個被展示統治成果的景點，正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下逐步建構而成的。一九二〇年代以後，隨著殖民者的「理蕃」政策與人類學者的田野踏查，台灣原住民的面貌逐漸呈現在各種文本當中。無論是官方的統計報告或是人種調查，都讓台灣各原住民族被細微而理性的研究、分析。而另一種再現方式，則是藉由藝術創作者的凝視，感性的展現在繪畫、照片或文學作品之中。作為一位人類學者，森丑之助以其對台灣「蕃地」的熱衷與長年研究，不僅替殖民政府蒐集許多有助於理蕃政策的資料，也提供美術家在創作原住民題材時的協助¹²。因此，不難想像他在規劃佐藤春夫的行程時，會將「蕃地」視為「台灣該看的地方」。縱使後來因為天候的緣故，其中的行程有些延宕或取消，但是佐藤春夫還是在情況許可之下，盡量遵守森丑之助為他定的計畫。（〈彼夏之記〉，頁 344）在他的台灣相關作品中，多篇涉及原住民的書寫，就是這次規劃行程下的產物。

因此可以藉助森丑之助的台灣導覽，而從博物館學的角度來詮釋佐藤的旅行書寫。博物館學的特徵，基本上是以抽樣的文物取代文化的全部。殖民地的博物館學，就在於殖民地的自然與人文永遠是等待被詮釋、被定義。確切而言，殖民地主體是淪為空白的、陰性的。透過這樣的命名，博物館學無非是為了豐富並鞏固帝國的知識與權力¹³。對旅行者來說，原住民是絕佳的凝視對象，既具有異國情調，又充分展現台灣的地域特色。「異國情調」也是讓佐藤春夫感覺「台灣實在是個很有趣的好地方」的原因吧。（〈蝗蟲的大旅行〉，頁 75）對已生活在現代化日本的作家而言，描繪頹廢的台灣南部風物或是荒野待墾的「蕃地」部落，可以展現文化的異國情調，卻也是一種將台灣主體陰性化的書寫傾向。在旅者的再現筆調下，台灣的內涵顯然和殖民者所宣稱的「同化」主義，或是刻意標榜的

¹¹有關日治時期台灣旅遊活動的「制度化」，以及台灣名勝古蹟的地理景象的建構過程，請參閱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出版，2005年10月，頁 346-390。

¹² 請參閱王淑津，〈高砂圖像——鹽月桃甫的台灣原住民題材畫作〉，《何謂台灣？：近代台灣美術與文化認同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建會，1997年2月，頁 121。王淑津的論文提到：1920年代以後，美術家與人類學者之間經常有合作的例子，如雕刻家黃土水製作「兇蕃的獵頭」群像（1921）時，就曾經透過台北博物館的森丑之助提供資料。

¹³ 根據班尼迪克特·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這三種制度，深刻地型塑了殖民地政府想像其領地的方式；在其統治下的人類的性質、領地的地理、殖民地政府的家世（ancestry）的正當性。請參閱班尼迪克特·安德生（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1999年初版，頁 183-200。這篇論文中所提出的博物館學的概念，除了是一種人類學知識的象徵之外，也和殖民者在選擇與展示殖民地圖像時的權力機制有關。

殖民地現代性，都扞格不入¹⁴。

本文將以佐藤春夫的旅行書寫為主題，藉此檢驗近代旅者的文化視域¹⁵。以往，在日本學者或台灣學者的研究中，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普遍都得到正面的評價¹⁶。然而，在他的作品中，台灣／殖民地的意象顯然被某些隱喻所纏繞。所謂殖民地的隱喻，或許是作者對於台灣的詮釋，但它也可能會讓日本人對台灣產生誤解或歧視。正是透過這些隱喻所蘊含的意義，可以讓我們理解旅者的凝視位置，並且展開對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的再閱讀，也期待能和先前的研究產生對話。

二、野性的呼喚：殖民地的「蕃地」行旅

我到這個森林來，好不容易總算在此嗅到蕃人族群的生活氣息的感覺。

我的目的可說已達到了。（〈霧社〉，頁 172）

這應該是一種朝聖的心情；向自然朝聖，回歸原始的心情。誠然，台灣山地在一九二〇年代左右，雖然普遍已經沒有獵首的行為，但世情仍是不太穩定的，所以到「蕃地」旅行還是有風險。由於受到森丑之助的影響，佐藤春夫不僅遵照他的行程安排進入台灣深山，而且也以朝聖者的姿態，希望能感受到原始族群的生活氣息。不過，他也必須具備探險的勇氣。

在日本統治初期，能夠進出台灣原住民部落的，只有殖民官吏與人類學者。後來，開始有日本畫家受聘來台，配合「理蕃」政策而作畫，再將畫作呈給日本天皇，以宣傳殖民者的「理蕃」成果。¹⁷除了來台工作的性質外，有志於探險、

¹⁴ 根據殖民政策的演變，日據時期分為綏撫政策、同化政策、皇民化政策。所謂的同化主義或是「一視同仁」，在表面上強調台灣人和日本人享有同樣的權利、自由與地位，並且對台灣實施與日本國內相同的法律制度。相對的，台灣人必須將自己的語言及文化風俗習慣同化於日本。其中，透過國語（日本語）教育的工具性目標，就是由「德育」、「智育」所象徵的兩個同化：「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但實際上，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卻存在著極大的差別待遇。有關同化政策的研究，請參閱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灣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都：三元社，2001年2月初版。

¹⁵ 在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裡，其中故事性較強的是三篇小說〈女誠扇綺譚〉、〈太陽旗之下〉（原題「奇談」）、〈魔鳥〉。〈魔鳥〉是佐藤春夫旅行於霧社到能高之際，隨行的警手說給他聽的原住民傳說，〈女誠扇綺譚〉與〈太陽旗之下〉（原題「奇談」）從題材看來，都是頗具獵奇情趣的小說。由於本文主要是探討佐藤春夫的旅行書寫，因此這三篇作品並不列入本文討論，日後將再專論研究。

¹⁶ 日本學者藤井省三、蜂矢宣朗、河原功，台灣學者邱若山、姚巧梅，都曾專論探討過佐藤春夫的旅台作品，並且給予正面評價。

¹⁷ 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1871-1945）於1907年受聘來台擔任總督府陸軍部通譯官，當時他以通譯官的身分製作許多歷史戰爭畫，並且配合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的理蕃政策而作畫。請

尋找新畫題的畫家，也逐漸到台灣接觸山地風景。根據顏娟英的研究指出，到「蕃地」或高山創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須仰賴軍警保護才能成行。所以早期的山岳畫家都和總督府方面保持良好互動，在創作完成時往往要獻呈作品給總督和相關官員。而他們所能到達的山區寫生地；台北到新竹、台中到南投的「蕃界」，以及從嘉義登阿里山的路線，在 1920 年（大正 9）以前，這些地點是台灣少數具有特殊身分的日本人的觀光開發地。¹⁸

佐藤春夫在九月中旬，開始依照森丑之助所擬定的旅行計畫，從高雄出發前往台灣中部山區。就旅者所需的條件而言，這次的行程可說是相當周全的。除了森丑之助提供的旅行預定日程表，由於民政長官下村宏的文人身分，使他對作家也相當禮遇。不僅一路上都有接受官方派令前來招待佐藤春夫的當地嚮導，甚至在下榻的旅館也獲得貴賓般的服務。就交通而言，台灣在 1908 年（明治 41），貫連西部平原的縱貫鐵道就已全線通車。以縱貫線為主軸，日據時期還發展出綿密的支線路網，其中以各製糖會社經營的營業線及私鐵和手押軌道最為重要。¹⁹在佐藤春夫的各篇紀行中，可以看到他搭乘不同交通工具的描寫，也能從中窺探出各地的現代化程度。以童話型態發表的〈蝗蟲的大旅行〉，就是用童趣般的筆調，敘述作者在從嘉義到二水的鐵道上，和一隻蝗蟲共同搭乘火車的有趣體驗。這篇小品文，不但勾勒出作者的旅行風景，還顯現出他對於自然界觀察的親密感及敏銳度。

從〈蝗蟲的大旅行〉以降，要觀察佐藤春夫的番地旅行動態，可以在〈日月潭遊記〉與〈旅人〉得到更為清晰的線索。這兩部作品所書寫的時空其實是重疊的，因此它們之間也有一種互文關係，但顯然〈旅人〉的篇幅是比較長的。兩篇相互對照後，就可以接續〈蝗蟲的大旅行〉之後的旅程路線。從二水下車後，作者搭乘了製糖會社的私線鐵道。但是由於天候造成濁水溪氾濫，沿線的鐵軌被沖毀，後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下車步行好長一段路後換搭另一列車。途中在某個車站下車後，又再搭乘台灣電力會社的台車到集集停宿一晚。第二天才坐著由苦力所擡的椅轎到日月潭參觀。基本上，〈日月潭遊記〉與〈旅人〉是在描述這段旅程的見聞。

其實，在轉搭台車進入集集之前，佐藤春夫並不知道自己此行會受到官方盛情的招待：「在一個不知名的寒村小站，我下了車，實在不想下，可是車子已不再前進了。我有點日暮途窮之感了。」出乎意料的是，在剪票口竟然有一位年輕

參閱顏娟英，〈近代台灣風景觀的建構〉，《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九期，2000 年 9 月，頁 185-189。以及羅秀芝，〈石川欽一郎：日本殖民帝國的美術教育者〉，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¹⁸ 請參閱顏娟英，同上註，頁 189。

¹⁹ 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349-350。

的紳士在等他。「從這裡開始，我在這王土之邊的山中，有三天左右，受到貴賓似的招待。」（〈旅人〉，頁 108）作者在這趟旅程，獲得相當多的人力支援。此外，在交通方面也是大費周章，歷經各種方式才逐步地接近霧社山區。由於先前本來擬定要去的阿里山，遭受到大颱風的影響，導致登山鐵道完全不通而取消行程。因此，佐藤春夫特別在意此行，亦即到日月潭再前往霧社的路途，是否能順利抵達。如此長途跋涉，支持他的動力，應該是野性的呼喚吧。

佐藤春夫在〈日月潭遊記〉一開頭就提到，當他準備從集集前往霧社之際，在下榻的旅館裡耳聞山地的高山族爆發「薩拉瑪歐蕃」事件²⁰：「無意間，鄰室的高談闊論聲傳來，讓我大吃一驚的是，生蕃蜂起，霧社的日本人全滅的消息。霧社，乃是在參觀完日月潭之後我所要前往的地方。我是無論如何一定要到蕃界去一趟，也想要名叫能高的高山去的。」（頁 59），由於當時人們誤傳事發的地點就在霧社，所以連平地的埔里地區也浮動著不安的情緒。因此，他在另一篇文章〈霧社〉之初便傳達了這樣的疑惑：「霧社本就是蕃界的第一大都會——這樣說大概不誇張，那裡至少有一百多個內地人住著，而且那個社裡的「蕃人」也應該不那麼野蠻才是。一百多個內地人悉數被殺，這件事是絕不可能的。」（頁 149-150）霧社在一九二〇年代之初，已經是個步入文明的現代城鎮，所以佐藤春夫才會對傳聞有所質疑。他當然不會料到，這段謠傳在十年後的 1930 年（昭和 5）竟然成為事實，而爆發了震驚殖民者的「霧社事件」。

聽到風聞的第三天，佐藤來到埔里，然後再搭台車上霧社。在前往霧社的途中，佐藤春夫遇到一群身穿「蕃衣」的搬運工，其中有個「蕃人」因為帶著內地車夫常用的帽子，吸引了他的目光。此外，佐藤更注意到了：

有一點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這人一看就知道他得了文明病，這不是從他的風采的趣味得知的。他的鼻樑可憐已凹塌下去，醜陋的鼻孔就在顏面的正中心。在這個蕃地，而且是在蕃人之中發現梅毒患者，對我而言太意外了。（〈霧社〉，頁 156）

²⁰ 關於「薩拉瑪歐蕃」事件的記載，當時拓務省管理局長生駒高常所寫的《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中，在檢討 1930（昭和五）年霧社事件之前近幾年的「蕃情」時，提到自從 1911 年（明治 44）以來，雖然沒有表面化的反抗事件，但以馬赫波社頭目莫那·魯道一派為中心，每逢警備力單薄，就企謀反抗。在報告中他列了三件記錄，其中就有 1920 年（大正 9）的「薩拉瑪歐蕃」事件。文字中記載，莫那·魯道趁當時霧社附近的警備員赴「薩拉瑪歐」討伐時，企圖屠殺內地人，但被當時一名巡查部長識破，因而阻止了叛變；生駒高常，《霧社蕃騷動事件調查覆命書》（拓務省，1930 年（昭和 5）11 月），油印，密。本文參考之復刻本係由戴國輝編，魏廷朝譯，《台灣霧社蜂起事件：研究與資料》（下冊），台北：遠流、南天共同出版發行，2002 年 4 月初版一刷，頁 387-388。

在霧社目睹「蕃人」罹患梅毒，之所以會讓佐藤如此驚訝，是因為「蕃地」向來沒有這種病的存在，它是文明病的一種。梅毒是依賴性行為來傳染的，所以是從都市（平地）傳播到山地的。梅毒會被稱為「文明病」，自然和現代化與資本主義所形成的性產業有極大的關係，這也意謂著霧社的「蕃人」有性交易的事實存在。而且這個問題必然將隨著番社的現代化而更加蔓延，成為文明性的負面表徵。作者的反應，也大部份體現了內地人對原始族群的觀感；「蕃人」是純真無垢的人種，所以不會受到文明的汙染。這樣的觀感當然有其盲點，因為這種現象的發生，是伴隨「蕃地」的現代工程而來，疾病傳染的情況只會有增無減。如果殖民者不開發山區，應該是可以減低文明病的入侵的。

在 1930 年霧社事件發生後所發行的《理蕃之友》，已經公開檢討這種疾病在「蕃地」的傳播速度，並且藉此譴責「理蕃」政策的過失²¹。在《理蕃之友》（1932 年（昭和 7）2 月號）的第二期，有一篇討論「蕃人」梅毒問題的文章〈蕃人的黴毒患者〉。在這篇文章中提到：「蕃婦」的貞操觀念本來是很強固的，而且「蕃地」對於通姦等問題也有很嚴酷的制裁方式，這是他們自古以來就自然形成的傳統風紀。但是現在到「蕃社」旅行時，卻會聽到「蕃婦」逐漸罹患梅毒的消息。作者將箭頭指向平地都會習氣的流布，在交通工具的日趨便利與運輸快速，也將梅毒這種文明病傳染至「蕃社」。而且，在「蕃人」對疾病本身與傳染途徑等知識都不瞭解的狀況下卻有很多人感染，最應該檢討負責的就是「理蕃」警察，因為他們的教導與取締不夠才會導致這種情況發生。²²此篇文章最後把矛頭指向「理蕃」警察，斥責他們的怠忽職守而導致性病在「蕃地」傳播。

在殖民者眼中，「蕃人」的天性有其野蠻、無智的一面，卻也帶有純潔、天真的色彩。因此，在原本清淨無垢的「蕃地」裡，會有「蕃人」受到梅毒的污染，無疑是「理蕃」政策的疏漏之處。然而，這種文明病的產生，絕對不只是「理蕃」警察的疏失而已，帝國資本主義對於「蕃地」的滲透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基本上，近代文明的滲透傳播是和身體的疾病有其邏輯關係的。由於高山原住民族傳統上生活在山區，他們依賴遊耕與狩獵維生，容易感染的是以動物為媒介的寄生蟲。但是，自從殖民者為了山林資源，開始在山區修築道路，這些道路讓文明勢力入侵到「蕃社」，也便於將文明人的傳染病源傳入。范燕秋在研究中指出，日本治

²¹ 《理蕃の友》於 1932 年（昭和 7）1 月創刊到 1943 年（昭和 18）12 月廢刊為止，共發行一百四十四期，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的機關誌。《理蕃の友》的發行是肇因於霧社事件，因此這本雜誌也是屬於霧社事件後理蕃體制改革的一環。有別於《台灣警察時報》的閱讀對象是平地勤務的警察官，《理蕃之友》是理蕃警察的專用機關誌。請參閱近藤正己，〈「理蕃の友」解題——「理蕃政策大綱」から皇民化政策へ〉，收入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理蕃の友》【別冊：解題・總目次・索引】，東京：綠蔭書房，1993 年 10 月復刻版第一刷，頁 3-14。

²² 不著撰人，〈蕃人的黴毒患者〉，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理蕃の友》，第一年二月號，1932 年（昭和 7）2 月 1 日，頁 7。

台之後，泰雅族傳統疾病觀受到相當大的衝擊。新的疾病型態不斷出現，疾病處理的方式也因殖民者的強勢介入，而產生前所未有的改造²³。另外，劉士永根據後殖民醫學論者大衛阿諾的觀點，指出阿諾對近代科學醫學(modern scientific medicine)的看法；在殖民主義與近代醫學的發展過程裡，殖民擴張不僅帶來新的醫學，也造成疾病的新形態。同時，殖民醫學的建構不再是殖民者一廂情願的安排，而是與殖民地經濟環境、社會結構甚至是自然環境妥協後的產物。²⁴從他的觀點來看台灣的醫學發展史和疾病史，當可獲得相當有力的證據。對於台灣的島民而言，殖民者帶來現代的醫學觀念，是為了因應台灣特殊的風土與疾病，但是新的醫學觀念卻也帶來新的疾病形態。「蕃社」道路的開發，也為原住民同時引進了現代文明與現代疾病。

道路的開發與規劃，誠然是一種殖民權力的延伸。佐藤春夫來到霧社之前，就知悉此地是「蕃界」第一大市鎮，但他還是期待能看到充滿原始氣息的部落，這種心情也頗能呈現出內地人對台灣原住民的蠻荒憧憬。就因為他對「蕃人」存有未脫稚真的想像，所以在遇到梅毒患者時才會大感意外。然而，當「蕃社」已經無法抵擋殖民者的文明勢力時，「現代性」與「現代病」會在霧社同時出現，這是可以想像的。

在殖民者的文化改造下，「蕃人」的生理所承受的，不只是新的疾病而已，還有身體的馴化。在〈日月潭遊記〉與〈旅人〉都描寫到作者被招待去觀看「蕃人」歌舞表演的經過。在抵達日月潭邊的旅館後，有一位電力會社的技師來拜訪佐藤，順便邀約去參觀在潭對面岸邊的「蕃社」：「帶著酒當禮物去觀賞他們的歌唱及舞蹈吧！來這裡的人，去看他們的歌舞已成為一種習慣，『他們是水社的演員。』他做了這個不知是打趣還是別有他意而令我不解的說明。」（〈日月潭遊記〉，頁 65）所謂「水社的演員」，是指這群「蕃人」會在遊客來訪時，換上傳統的服飾出來表演歌舞以娛眾人。原本在豐收等重要節慶才祭神的歌舞，是「蕃人」文化中的一種儀式。但是，隨著觀光客的湧入，這些接受文明開化的「化蕃」，也就成為被「觀看」的對象，透過肢體表演來展現地域性的異國情調。

在佐藤春夫的眼中，「化蕃」們不僅已接受教化，也欣然於這樣的生活：「現在，這一帶的土地雖是毗臨蕃界，卻已經是王土之內了。逐白鹿至此移住的化蕃，

²³ 請參閱范燕秋，《疾病、醫學與殖民現代性：日治台灣醫學史》，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年3月初版。尤其是〈第八章 疾病、邊緣族群與文明化的身體〉，雖然作者是針對宜蘭山區的泰雅族為分析對象，但是在殖民者開發山林的權力運作，或是地理環境與人種方面，都和南投山區的泰雅族群相當類似。在日據時期，殖民者也是依據分佈的地區，而把泰雅族分為「南澳蕃」與「溪頭蕃」，只是地域上分布不同的分類法，但都是屬於泰雅族的一支。因此筆者用范燕秋的研究來探討霧社山區的蕃人（泰雅族）。

²⁴ 劉士永，〈大衛阿諾與後殖民醫學〉，《當代》，第170期，2001年10月，頁30。

為助我們——這個風光的訪問者——的座興，正暢飲送禮的酒為樂呢。」（〈日月潭遊記〉，頁 68）移住於此的「化蕃」，儼然成為在「王土之內」的臣民。但是，想必作者不會進一步探究他們依居至此的歷史背景。他所看到的，是一群能夠以表演娛樂觀眾，又沉醉於美酒的「蕃人」：

安閒地住慣了之後，他們甚至不知道，其他同類的人，已漸漸逃入深山之處，而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已成了王土之民了。丟棄勇猛的精神，沉醉在別人施捨的美酒中，用祖先傳來的神聖的歌與舞蹈，獻媚於好奇的旅客。——喂！你們可知道在霧社的深山處，你們的同伴現在正在對我們的同伴進行可怕的攻殺嗎？（〈旅人〉，頁 127-128）

這一段深沈的文字，同時批判了「生蕃」與「化蕃」。作者把日本人塑造成無辜的受害者，「蕃人」的舉止則充斥著血腥與暴力。安住於帝國的王土之內，對旅客獻媚以換取回饋的「化蕃」，就顯得柔弱，喪失人格。在作者的心目中，他似乎有一個理想的「蕃人」形象。然而，他畢竟無法理解，是殖民者的權力運作讓「生蕃」與「化蕃」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這樣的結果，也不是台灣的高山原住民所自願的。他們或者被強行移住到平地，改變所有的生活方式。不然就必須逃往更深奧的山林，而終日惶惶於日本軍隊的追擊。佐藤春夫在面對「蕃人」暴動時，顯現出來的危機意識是日本人的正常反應。因此，他會抽離旅行者的情緒，而站在殖民者的立場，甚至用文明者的觀察視域來進行批判。

野性的憧憬，促使佐藤春夫跋涉到原住民部落。但是在〈霧社〉、〈日月潭遊記〉、〈旅人〉等作品中卻展現了他對原住民的辯證思維。同樣的，他對文明與自然之間，也存在著複雜的情感。當他聽人說日月潭要進行水力發電計畫時，深覺此項工程事業實在浩大壯觀，卻又興起對人類破壞自然之作為的輕蔑感。到底哪邊的比重較大呢？作者自己也無法確定。（〈旅人〉，頁 123）當時他是否知道，旅行中給他協力最多的民政長官下村宏，就是策劃日月潭水力發電計畫的主導者？如果佐藤能夠以對待原始自然的情懷來理解「化蕃」，或許會領悟到「化蕃」被改造的生活型態與被馴化的柔軟身體，並不亞於大自然的人為破壞。

三、旅人之眼：女性與異色想像

在盛夏的台灣，佐藤春夫的憂鬱似乎沒有被炎熱的空氣所蒸發。沉浸在異國

情調的同時，他也不時探索熟悉的情感認同。透過景致與人物的互動，可以看出他內心世界的細微感受。無可否認的，佐藤春夫對於自然風景投注了相當細膩而感性的觀察視角，這和一般的旅行者是不盡相同的。在十多年後，他寫了〈社寮島旅情記〉，以回憶初抵台灣時的奇妙體驗。這大概也是他的台灣相關作品中，最明確感覺到台灣暑氣的一篇。到基隆社寮島的短暫時光，帶給作者似夢似幻的印象：「在我生涯中曾經停留過一小時半左右的那個小島的記憶，在過了十年以上的現在回想起來，似乎已成為奇妙的一夕之夢了。」（頁 323）這個島所賦予他的奇異氛圍，應該來自亞熱帶島民的生活型態，以及島上所蓋的一座媽祖廟。在發表〈社寮島旅情記〉之前，1926 年（大正 15）他就寫過一篇媽祖為主題的〈天上聖母〉。作者除了概略性介紹了這位女神在台灣所受到的尊崇，以及北港朝天宮的興建過程之外，他也談到了在基隆社寮島的媽祖廟的見聞。參訪北港的朝天宮，也在森丑之助所規劃的行程當中。從基隆社寮島的媽祖廟到北港的朝天宮，佐藤春夫應該可以感受到媽祖崇拜在台灣是相當重要的民間信仰。但是，他還是說出了旅行者的異想：

我空想著，被當做船神的天上聖母會不會原來是乘著船而來的神呢？紅毛或南蠻在其船中奉祀而帶來這個地方的神呢？在各種東西被移植過來的同時，同化於此地的風土，這個女神也是一樣自然地支那化而成為道教的女仙吧！她的古遠的誕生反被重新創造出來吧！假若我在媽祖廟的那個極盡丹青之能的裝飾之中能發現十字架之類的圖樣，那我就有當場斷定我所想像的勇氣了。（〈天上聖母〉，頁 254）

媽祖確實是乘著船而來的神，但卻非由紅毛或南蠻傳入的。透過這段文字，就可以知道佐藤對於媽祖信仰的一無所知。因為，媽祖是道地的中國信仰，並不是傳來台灣以後才被「支那化而成為道教的女仙」。他會聯想到媽祖信仰與紅毛或南蠻之間的關係，也是對異文化的歧異想像吧。台灣是一個移墾社會，因此媽祖信仰是由中國來台的漢人所引進的。明朝末年，隨著漢人在台開拓的推展，從澎湖到台灣府城，再由府城向南北擴張，終至分布到台灣各地。²⁵而且，日本也有媽祖信仰。最初亦是在明朝由中國船隻帶入，開始分布在南部的薩摩半島、九州地方的五島、平戶、長崎等地。²⁶因為欠缺對台灣宗教與文化背景的理解，才會讓佐藤春夫對媽祖有如此怪異的幻想。

²⁵ 請參閱石萬壽，〈台灣媽祖信仰概說〉，收入《台灣廟宇文化大系〈貳〉天上聖母卷》，台北：自立晚報，1994 年。

²⁶ 請參閱李獻璋，《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 年 8 月發行，頁 491-593。

就像〈鷹爪花〉描述佐藤在鳳山參訪了一間尼姑庵，也有如一場午後的夢遊。作者到台灣南部的古城作客時，主人的朋友邀他到附近的尼姑庵走走。他在尼姑庵裡間門扉內，看到一個若隱若現的年輕女子。她似乎是同行友人暗戀的對象，因為討厭男人，所以即將出家成為尼姑。二個男子在無聊的午後，去造訪門禁森嚴的尼姑庵，已頗具異色的想像空間。而被男人凝視的對象，卻只看到水色衣裳的身影搖晃於眼底，而無法捕捉女子的白皙容貌，令人倍感惆悵。不過，午後傾盆而起、驟然而止的一場雷雨，倒是洗滌了旅者疲憊、焦躁的身心。下過雨的庭院，嬌豔欲滴的花朵，一道彩虹亮麗地浮現在天空中；諸般情景讓作者有種身在夢中的幻覺。然而，這些景物與天候，對台灣人而言是日常生活上的部份。在佐藤的台灣相關作品中，凡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事物，反而讓他進入一種「非常」時空的錯覺。在異地旅行，本來就是一種從「常」到「非常」的跨空間移動。旅者對異地生活的不真實感，也來自強烈的跨文化語境。

因此，在異鄉的文化語境中，旅者還是習於觀看自己所認同的事物。相對於台灣南部盛夏的炎熱感，佐藤春夫在「蕃地」書寫中，反而較常去刻畫景色的蕭瑟。他以水彩畫式的寫生風格，對照台灣與日本的風景，企圖尋找自己熟悉的感觸。例如，在看到日月潭時，作者是頗為失望的。因為日月潭展現了「一種雄大的地方所特有的奇異的寥落感」，但這卻與日本人所說的「寥落感」很不一樣，因此他萌生了奇異的觀感：

我是被『台灣名勝舊蹟誌』的「令人驚訝的是再海拔二千五百尺的山上有周圍約四里多的大湖。水深平均一丈五呎，常呈紺碧之色。疑其池底有蛟龍暗潛」這樣的敘述所騙，而一直以為是雄大清澄的境地呢。但是，浮現在我面前的，並不是周圍四里餘的大湖，而只是個出奇地大的沼澤。（〈日月潭遊記〉，頁63）

日月潭到底是大湖或大沼澤，這是個相對性的問題，端看觀者所比較的對象而言。《台灣名勝舊蹟誌》上的導覽文字，縱使給予佐藤一個概括的意象，但他也許在期待一個有如日本湖泊的境地²⁷。不僅是在風景之上，他在面對異性時，也會聯想到心目中戀慕的對象。在〈日月潭遊記〉與〈旅人〉中出現過的旅館服務生，是一位臉色稍微蒼白、肌膚看來頗精緻的女侍。她寂寞似地伏目微笑的姿態，細微地觸動了帶著旅愁的作者的內心。他以細描式的文字形容女子的形貌：

²⁷ 佐藤春夫看到的是由杉山靖憲所著，《台灣名勝舊蹟誌》。本文參考的版本是根據日本大正五年(1916)排印本影印；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

整個看起來，宛如倒垂在水邊綻開的花朵，有著哀婉而又惹人憐的表情，以如此深山中的旅店的女侍來說，是相當有品味的了。她有著斷斷續續地帶著咳嗽說話的習慣，給人的感覺中有著無助又依人的音調。臉上的上半部和我所喜歡的某個人有點像。（〈日月潭遊記〉，頁67）

這是一位從日本長濱來台灣深山（日月潭）工作的女子。從敘述來看，極具有日本女性的柔弱美，作者還發現她的臉和自己心愛的人有相似之處。從容貌、姿態、音調來判定，佐藤認為這個女子是相當有韻味的。相對的，也看出了佐藤對女性的審美品味。但是他在〈霧社〉中描述到的原住民女性，則又具有另一番的異趣。透過原住民女性與日本女性的對照，應該能側面說明佐藤對台灣的文明觀。

當他抵達霧社後，投宿在霧社俱樂部。這裡並沒有旅館，為了偶爾出現的稀有旅客，才有這個俱樂部的設施。這也再度說明了，「蕃地」旅行確實是少數具有特殊身分的日本人的觀光活動。在俱樂部內的女侍是一位當地原住民，年輕的少女以著不熟練的動作為佐藤服務，因此作者試著和她對話。她用「鸚鵡式的語調」一句句地回答著問話，讓佐藤起了童心：

我用自己的手指頭指著自己的臉，比著她臉上刺青的模樣。她笑了。把臉上的那個部份用手掌掩住。這個動作與表情，讓我感受到親愛之情。不過，老實說，那種感情，很類似我對我的愛犬所懷抱的那種感情。（〈霧社〉，頁162）

作者和少女之間的親愛之情，是以愛犬為比喻對象的。基本上，他會有這樣的情感表現，主要在於女孩的順從態度。阮斐娜認為這也隱喻了支配／從屬、殖民者／被殖民者之間的關係²⁸。另外，山路勝彥在研究中則指出，台灣總督府的基層殖民官吏在建構「蕃人」觀時，不同於西方帝國主義對於征服對象採用「女人」的陰性化隱喻，而對於台灣原住民使用「兒童」這種修辭的純真無垢、可愛化隱喻。山路勝彥特別指出佐藤春夫在〈霧社〉中的「蕃女」書寫，探討其中對原住民的再現視域。他認為〈霧社〉這篇紀行文中持有的筆調，應該可以窺探出

²⁸ 阮斐娜認為，佐藤春夫在書寫對台灣原住民的形象時，雖然避免使用聳動視聽的方式並且想要表現對他們的同情心，但是在這裡對少女／愛犬的比喻還是流露了優越的殖民者心態。請參閱 Faye Yuan Kleeman（阮斐娜），*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of Taiwan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 2003, pp.36-7.

當時一般日本人所共有的對異民族的認識。在日本開始發展帝國的版圖之際，透過政治運作而逐步建構了特定的台灣原住民族觀。在通俗化的論述上，一方面他們會刻意凸顯「蕃人」在野蠻性上的「混沌無知」，另一方面則會從現代性的角度來幻想這群尚保持「純真無垢」的未開化人類。近代日本人的異族觀就擺盪在這兩種論述中。²⁹因此，原住民常被視為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種。在佐藤眼中的「蕃女」，有如一個可愛的、順從的兒童或寵物。這種他者化的描寫方式，也和博物館學的展示／詮釋方式有關。

佐藤後來去參觀「蕃人」小學時，在訪客的面前，老師要學生回答問題，但是成果卻不盡理想。作者認為困難的原因，並不在於他們對日語的理解程度，因為這些小孩都能說得頗為流利。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們欠缺對文明世界的想像力：

只是，他們被灌輸著在他們的世界裡無法想像的其他的概念。而灌輸者與被灌輸者之間的苦心，實在是無以附加的同情。（〈霧社〉，頁 164）

其中，唯有一個小女孩能有較好的表現，但是作者提出這樣的看法：「我認為那只是語詞的暗誦而已。」這就像鸚鵡學舌一樣，只是音調的模仿，而非智力的開發。佐藤雖然質疑了「理蕃」政策下的「蕃童」教育，但他也認為「蕃童」的智力是有一定侷限的。然而，殖民者對於「蕃人」施以開化的教育，重點本來就不著重在智力的啟蒙，而是柔軟身體的訓練。透過現代時間的觀念，讓他們每天到學校來，進行升旗典禮、做體操、合唱等學習方式，以達到對理性身體的規範。因此，殖民者的蕃童教育，並不在於培養近代思考，而是一群順從的新國民。誠然，佐藤看出了這種教育的表面性，但間接批判了殖民者的教育體制。接受教化的「蕃童」只有更加印證了被殖民者的身體馴化，在文明與文化之間，原住民的改造恐怕是比漢人更劇烈的。

佐藤春夫到台灣旅行的心理因素，源自私人情感的問題。³⁰當他來到台灣之後，相對於東京生活的快速節奏，南方島國的遲緩步調應該能讓佐藤放慢心情以省視自我。他會跋涉到霧社山區，也是期待看到原始部落的生活吧。對內地人而

²⁹ 有關山路勝彥的研究，對於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在呈現「蕃人」的措辭上，從野蠻、兇性的成人到無垢、可愛的「兒童」之演變過程與權力運作，請參閱氏著，《台灣の植民地統治——〈無主の野蠻人〉という言説の展開》，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2004年1月第一刷。尤其是〈第三章 植民地と「子ども」のレトリック〉（殖民地台灣與「兒童」的修辭學），頁 83-110。

³⁰ 佐藤春夫之所以來台散心，是因為他和妻子的婚姻生活不順遂，而且當時他又跟谷崎潤一郎的妻子千代有愛戀關係。因為這些事情而感到鬱屈的佐藤，才決定來台散心。關於這些心情，他在〈旅びと〉（旅人）這篇文章中有稍微提到。〈旅びと〉，發表於《新潮》，1924年（大正 13）6月，後來收入單行本《霧社》。他在 1921年（大正 10）也完成了一本《殉情詩集》。

言，遊覽台灣的「蕃社」是比參觀漢人社會更具異國情趣的。因為，當時台灣的平地都市多已邁向現代化（尤其是北部）。縱使霧社是山地的文明市鎮，但是在日本人眼中，它還是深具原始氣息的。因此，他對於異文化亦是滿懷獵奇趣味的。〈霧社〉有一段描寫到佐藤抵達霧社的當天夜晚，在街上被一名「蕃女」搭訕，進而受邀拜訪她家。他會答應少女的邀約，只是單純的想要參觀原住民的住家，可是當佐藤走進黑闇的屋內後，女孩卻很快地把門鎖上。在女孩更進一步地挨近他的身邊時，「那少女輕輕地握住我的手腕。我感到一股不可名狀的恐怖。而且那恐怖感正一刻刻地升高。」（頁 179）對女孩的誘惑，對「蕃人」的恐懼，對內心慾望的理性抗拒；錯綜複雜的心情讓佐藤陷入精神緊繃的狀態：

讓我之所以如此感到恐怖，乃是因為這個不知其來歷的少女的週遭以及這房子的那種陰慘的氣氛使然。我現在是在門邊，但裡面有誰在，不得而知，說不定會有蕃人拿著蕃刀突然跑出來。——理性否定掉這一種憂慮，心情則是不然。（頁 179）

當女孩親暱地拉著作者的手對他說：「有錢嗎？」這句話才讓他恍然大悟，也聯想到三天前在路上碰到的梅毒患者：「那個缺鼻的時髦的蕃丁」。但是，他還是無法用放鬆的心情面對少女。因為在台灣的日本人甚至是漢人，由於對「蕃人」文化的無知，所以普遍存在著原住民任意出草的觀感。〈霧社〉在其他文字中也描寫到，漢人對於「蕃人」叛亂的態度是充滿敵愾心的，這是因為漢人社會對原住民也帶有偏見。佐藤春夫雖然極力保持理性的態度來面對少女，但是恐懼還是戰勝了理性：「不管如何，此際最好的方法乃是逃離這房子，並且，但願這個少女只是個單純的賣笑婦。這樣的話，只要給她錢，她就會樂於放我離開這裡吧。」（頁 181）少女接受他的錢之後，被作者喝令把門打開。在他狼狽地衝出門外後，卻沒有察覺那個女孩竟無聲地跟了出來：「她無言含笑，然後坐在那邊的草地上。突然間，我想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我真是愛胡思亂想。該不會是這個蕃女愛上我了吧。我因為自己的這樣的空想，而頓覺這少女很可憐。也就連帶產生了想和她說句話的心情。」但是當他們接近交談後，清冷的月光映照出她熱烈的目光，少女眸子燦爛發亮地令佐藤感到戰慄：

我突然沒命地往山丘下狂奔。我說不上來是什麼原因？我自己的解釋是，那大概是因為恐怖與誘惑的複雜交錯使然吧！（頁 184）

在理性與慾望的拉扯下，佐藤選擇逃離現場。他最終掙脫了少女的誘惑，是

因為駭怕於蕃人嗜血殺人的野性所致吧。佐藤對台灣原住民的認知，還是擺盪在野性的「混沌無知」與童心的「純真無垢」兩者之間。在許多西方帝國的旅行家、小說家的文本中，原住民女性的肉體與野性美，象徵了原始、熱情的肉慾。藉由作者的書寫，她們展現了無限的性魅力。這其中，當然也投射了男性的性幻想³¹。在〈霧社〉這篇遊記裡，相當鮮明的，原住民女性展現了兩種極端化的形象。一方面，她們有如天真無垢的可愛孩童，讓作者湧起親愛之情。另一方面，她們卻散發出肉體魅惑與原始野性，使主角陷入慾望與理性的掙扎。拉開視角來看，〈日月潭遊記〉、〈旅人〉、〈霧社〉所展演出的一系列原住民書寫，具體再現了佐藤春夫的蕃人凝視。對異性與異文化的探索，也同樣出現在〈鷹爪花〉、〈天上聖母〉、〈社寮島旅情記〉當中。透過旅人的眼睛，佐藤春夫在異國的文化語境裡，其實不斷追尋的，是自我文化的記憶與認同。

四、對峙與對話：與林獻堂的論辯

回到平地社會，回到理性情境的佐藤春夫，在〈霧社〉的最後文字，反思了自己看待台灣原住民的想法。從霧社山區下到台中之後，佐藤春夫受到州知事的招待。那晚官邸宴會的話題，都圍繞在「蕃人」的暴逆事件。當時正好有一個從山地視察回來的官員，傳達了軍方使用飛機作戰討伐「蕃山」的計畫。在宣布完這個消息後，州知事一方面大表贊成，另一方面卻意味深重的注視著作者說：

從內地來的旅行者總是在僅僅一瞥蕃山之後，就感覺到蕃人像詩一樣令人喜愛，但是，對統治者而言，實在是沒有比他們更棘手的東西了……云云。我本來就覺得自己沒有回話的資格，只有對他那放膽灑脫而響亮的哄笑報以無意義的、貧弱的微笑而別無他法了。（〈霧社〉，頁 187）

在州知事的宴席中，他無力反駁官方的政策，只能報以虛弱的微笑。但是，藉由森丑之助的一番話，作者似乎想藉此思考「蕃人」出草的儀式性意義，而非嗜血的本性使然。他描述在《台灣蕃族誌》的作者（森丑之助）家中作客時，和主人從新聞中聽到當時鎮壓番地的消息。一架被派去作戰的飛機遭到破壞，飛行員尋獲後卻發現他的首級與陽具被切斷。透過作者的再現，森丑之助以一位人類

³¹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年初版，頁 306-307。

學者的同理心來陳述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那時，M氏的溫雅的表情也顯示出微微的憂鬱，他說，其實蕃人殺人，其目的決不在於殺人那件事上，他們只不過是為了一種宗教上的迷信而要得到人的首級而已，假如能得到首級就了事，他們勿寧是希望留下那人的性命的。（頁 189）

這段敘述說明了，不僅是發表言論的森丑之助，甚至連追述整場回憶的佐藤，幾乎都對「蕃人」抱持著同情的態度。森丑之助透過人類學者的常識來說明「蕃人」的出草儀式，但是出草是否為宗教的迷信，森丑之助的解釋恐怕還是無法言明。佐藤春夫會把這段話記錄下來，或許也是要重新思考自己對「蕃人」的想法吧。根據姚巧梅的研究，佐藤春夫旅台前後的文本，出現了微妙的差異。佐藤在台灣旅行之後，除了創作量明顯增加之外，在作品內容上也開始展現對社會與人類的關心，這在他初期的成名作〈田園的憂鬱〉（《文藝雜誌》，1916年（大正5）11月號）是看不到的³²。姚巧梅認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應該和佐藤春夫在1920年的台灣、中國之旅有密切的關係。在經歷了台灣和中國的風土、人情、現實社會之後，對佐藤春夫的心境產生了強烈的衝擊，也讓他將注視自我的目光轉向人間。從而，他看待台灣原住民的異民族觀，或許也產生了一些轉變。

〈霧社〉的文化視角其實也觀察到了資本主義已經開始動搖「蕃人」的價值觀。相較於其他更具殖民者立場與觀點的日人作家，佐藤春夫在台灣相關作品，藉助南方地域風物的描繪，可以發現他對台灣人的同理心境。然而，佐藤凝視台灣的方式，還是刻意保持一定的疏離感。他透過人道主義的立場，傳達出對「理蕃」政策的疑惑，但在潛意識中是以理性觀察者的位置發言。在他的「蕃地」旅行書寫，雖然採取同情的立場來理解「蕃人」，卻還是保持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不自覺地流露出文化位階的優越感。基本上，作者對「蕃地」的觀感是相當複雜的；因為各自的文化處境不同，也無法真正進入原住民的生活內部與思想世界。可以確定的是，「蕃人」所帶給作者的文化衝擊，是台灣旅行中印象最深的。這個看法可以經由他的作品〈殖民地之旅〉中窺探到一些端倪。

〈殖民地之旅〉的主題，是佐藤從霧社山區回到平地後，和中部文化界人士的會面情況³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和霧峰士紳林獻堂（1881-1956）的對話³⁴。

³² 姚巧梅，〈佐藤春夫台灣物の「女誠扇綺譚」を読む——「私」と世外民を中心に〉，《日本台灣學會報》，第三號，2001年5月。

³³ 關於佐藤春夫在拜訪過程中嚮導者A的身分，以及各個會面人士的人物研究，已有學者提出

森丑之助為佐藤春夫安排的行程中，最後一站是參觀鹿港。因此在下村宏的斡旋下，台中州廳替佐藤安排了鹿港出身的臺灣人許媽葵為嚮導。除了到鹿港之外，許媽葵也帶領佐藤認識了中部的文人。佐藤在中部的最後行程，就是到霧峰林家拜訪。佐藤春夫和林獻堂兩人到碰面為止，其實都不知道對方的身世背景。顯然，林獻堂對於受到官方照顧的佐藤，是頗有「來者不善」的想法。因此開口之初，便詢問佐藤來台旅行的動機。當作者回答：「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林獻堂似乎不滿意這樣的答案。在他們一來一往的對話中，可以感受到林獻堂想要刺探佐藤來台的政治目的。他或許以為，佐藤是日本官方的代表，因此急於詢問佐藤對台的觀感。甚至在有警察監視、紀錄的情況下，他依然激動的發表台灣人對殖民政策的看法。林獻堂的最終用意，是要佐藤說出對台灣人問題的觀感。沒想到佐藤所能想到的，卻只是「蕃情的不穩」。（頁 330）

以佐藤在台停留的時間與景點來看，他的回答是相當合理的。尤其此行受到官方的庇護，他的待遇甚至比在台日人還要優渥。唯一讓他感到震撼的，大概就是在霧社山區和「蕃人」接觸的特殊體驗。因此，他會對「蕃情的不穩」有深刻印象，也認為那是台灣居民都會面臨的嚴重問題。然而，真正能和原住民交流的漢人，是相當少數的。林獻堂自然無法認同他的看法，他也對「蕃情的不穩」提出自己的見解：

果然，那是一個大問題，但這拿來和本島人與內地人的問題相比的話，就不覺得有那麼重大了。——這樣說，您或許會覺得我太本位主義。不過，第一，蕃人的人口與本島人比起來少得很。加之，蕃人就有如一般稱之為蕃人這名詞所示，和內地的文明比起來，其智力方面，早就有相當的距離，這個問題我想本身就很容易解決。但本島人的情形，在內地人看來如何，我不得而知，在我們本島人自身的自負而言，儘管現在無力作為，但卻是擁有古來傳統的深厚文明者。而且那文明的重要部分，我深信是和內地的有教養的人士們相通的。在這一點而言，我想可就複

細緻的研究，本文就不再處理這個議題。請參閱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的真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2004年3月初版，頁3-22；邱若山，〈「殖民地旅」をめぐる——『支那論』を越えるもの〉《佐藤春夫台灣旅行關係作品研究》（日文），台北：致良出版社，2002年9月初版，頁213-247。

³⁴ 林獻堂（1881-1956），名大椿，號灌園。他是台中霧峰望族林家第六代，從小接受漢文教育，20歲喪父後即接掌家政。27歲遊日時認識了梁啟超，從此在思想和學問上受他的影響很深。曾任霧峰參事、區長，並被受過紳章。1914年（大正3）呼應板垣退助的同化會，1919年（大正8）加入新民會並任會長。1921年（大正10）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林獻堂擔任總理，後又成為台灣民眾黨顧問，組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林獻堂在日據時期致力於民族運動，並積極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活動，期待能達到牽制總督府獨大的政治權力。戰後歷任彰化銀行董事長、省政府委員、台灣省通志館館長等職。1949年赴日就醫後即未再回台，1956年9月8日死於日本東京。

雜多了。（〈殖民地之旅〉，頁 331）

基本上，林獻堂的觀點絕大部分體現了台灣大多數漢人對於原住民的看法。因為當時能夠接觸到原住民的人還是以殖民體系的官僚為主，所以漢人對原住民多抱持著「異化」的觀感。在〈霧社〉一文中，也描述到漢人對於「蕃人」暴動的負面反應。會產生這樣的反應，一方面是因為漢人接受現代性思維的影響，而質疑「蕃人」的文明化程度。另一方面，也由於殖民者在「理蕃」政策上，刻意拉攏漢人成為聯合陣線。對林獻堂來說，「蕃情不穩」的問題性確實存在，但是更刻不容緩的，是本島人的地位。他所要提出的，是圍繞在漢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間位階高低的議題。他的重點在於，漢人古來擁有的深厚文明，其實和日本的漢文化傳統是相通的。甚至，本島的文化人士比來台的殖民者是更具有高度文明的。因此，「政治地位的優越，未必意味著文明的優秀。」（頁 333）林獻堂認為「蕃人」在台灣屬於少數族群，以文明性來說，「蕃人」確實無法和日本人相比，他還是想把焦點置放在本島人身上。林獻堂的立場，是亟欲質疑殖民者對於本島人的同化問題。

要理解林獻堂的文明觀，就必須探討他的思想啟蒙歷程。他的父親林文欽是具有濃厚的儒學思想的士紳，林獻堂從七歲開始，也在家裡設置的家塾開始接受以儒教為主的教育。陳培豐的研究有指出，作為接近文明的手段，林獻堂有拘泥於漢文的傾向³⁵。但是，在台灣殖民化與近代化的雙重進展下，林獻堂在語言上、生活上也無法排除日本的影響。從《灌園先生日記》當中，可以看到他積極學習日文的態度³⁶。另一方面，他開始關注到近代政治、經濟、學術和思想等範疇，對於近代文明的知識逐漸展現出強烈的興趣。後來，林獻堂透過介紹而閱讀中國洋務運動主導者梁啟超的一些著作，也到日本訪問梁啟超，進而招待他在 1911 年（明治 44）到台灣來訪問，主要動機就是建立在對文明的強烈憧憬。

林獻堂對佐藤春夫發表長篇大論，其實並不在雙方對話的基礎下進行的。因為佐藤對他的咄咄發問，只能夠以社交辭令應付。在有警察監督做筆記的情況下，林獻堂依然持續發言，可見他不僅有心理準備，也期待這番話能引起執政者的回應。林獻堂的最終目的，其實是抨擊當時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亦即田健治郎的「內地延長主義」、「一視同仁」等主張³⁷：

³⁵ 關於林獻堂學習近代文明的途徑，請參閱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都：三元社，2001 年 2 月初版，頁 195-208。

³⁶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第十冊，1938 年），：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2000 年。在該年 7 月 30 日（舊 7 月 4 日）的日記中：林獻堂記下他學習日文的辛苦：「去年一月二日起讀《國語教本》，」，

³⁷ 田健治郎（1855-1930），日本兵庫縣人。1919 年（大正 8）10 月至 1923 年（大正 12）9 月止，

總督閣下在赴任時都會就對本島人的政策大方針有所言明，有的說是，內地人、本島人平等；可是接著下一任的總督閣下又變成親和；以為決定親和了，再來的總督閣下卻又說是同化。在每個總督閣下而言，或許並沒有什麼矛盾。但，從同一總督府所為來看，難免令人覺得不無朝令夕改之觀。聽說是平等，我們就那樣做，接著卻又說是同化，這一來，我們本島人就不知何者為真，不知相信那個是好而感困惑了。（〈殖民地之旅〉，頁 332）

林獻堂希望殖民者的政策不要朝令夕改，而能夠有根本明確的定案。但是他顯然認為「同化」和「平等」之間是有落差的，所以才會發出這樣的疑問：「而那親和的方法本意，是應該同化呢？還是應該平等呢？」對他而言，漢文化是比日本文化更具有高度文明的。換個角度來看，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不正是要台灣人去同化於較低等的文明。林獻堂的論點相當顯然的，他也是採用文化位階優劣的觀念來抵制同化政策，只是殖民者諒必無法接受他的言論。不過，透過林獻堂的發言，倒是可以側面瞭解他對台灣的族群觀。

對於這段談話的虛實成分，我們只能透過佐藤春夫的再現，而無法從林獻堂的相關史料中獲知³⁸。然而，佐藤在這篇文章的後記卻特別註明了：「作者附記——事雖多實錄，無奈是十年前的記憶，而且加上行文虛實參半，切望莫因此拙文而有累及任何人的情事。」（〈殖民地之旅〉，頁 338）針對這段說明，河原功在研究中指出，佐藤春夫在〈殖民地之旅〉採取不具名的方式來描寫會面的人物，甚至將林獻堂寫成林熊徵³⁹，是顧慮到也許會給描寫對象本人或關係人帶來麻煩，所以姑且隱藏真名⁴⁰。然而就他和林獻堂的初淺交情，會把人名誤植是頗為合理的。倒是可以藉由這段話，看出佐藤對於當初和他會面過的台灣人士，是

擔任第八任的台灣總督，也是第一位台灣文官總督。他的治台政策標榜「一視同仁」、「內地延長主義」、「日台融合」等同化政策。

³⁸ 林獻堂的日記已整理出版，但是年代從 1927 年（昭和 2）開始，因此無法得知 1920 年（大正 9）和佐藤春夫會面的經過。請參閱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 年。本日記全套 27 冊，始於 1927 年，止於 1955 年，其中缺 1928 及 1936 年。日記內容有家族生活、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相關資料，極具史料價值，是研究林獻堂相當重要的參考資料。

³⁹ 林熊徵（1888-1946），字薇閣，是台北板橋林本源家族長房林維讓的大孫。日據時代中期開始掌管家政，1909 年（明治 42）在總督府鼓勵發展糖、鹽的政策下，出資成立「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並一手創立「華南銀行」。板橋林家與殖民政府之間的關係相當親善，這是和林獻堂的作風相當殊異的地方。

⁴⁰ 河原功，《台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學との接點》，東京：研文出版，1997 年 11 月初版。本文引用之中譯本由莫素微譯，〈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的真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2004 年 3 月初版，頁 17。

抱持善意的。

較令人疑惑的地方，是 1943 年（昭和 18）《霧社》再版時，〈殖民地之旅〉卻被佐藤刪掉。根據作者本人的解釋是：「在這集子裡所描寫的台灣是過去在台灣，且出版此集子時的作者與現在的作者，也存在了些許差異，基於此一原因，便暫且刪除了初版中之重要作品〈殖民地之旅〉。」⁴¹這個理由當然頗為牽強。還是把這部作品放回當時的歷史脈絡，或許可以得到一些解答。《霧社》從初版發行（1936）到再版，這七年的期間，不僅 1937 年爆發了中日戰爭，1941 年更演變成太平洋戰爭，而佐藤春夫也在 1938 年和 1943 年分別赴中國與南洋從軍。中國和日本戰局的惡化，或許讓佐藤顧慮到〈殖民地之旅〉中林獻堂擁護漢文化的論調，會敏感碰觸到殖民地的國族認同議題。此外，作者也成為從軍作家，已今非昔比。因此，他才會選擇把〈殖民地之旅〉刪掉，只留下原住民書寫的部份⁴²。〈殖民地之旅〉縱使遭到撤換，但是有關殖民地的處境，佐藤春夫已為臺灣人留下了一些見證。

五、結語：博物館學式的旅行書寫

佐藤春夫的台灣旅行，從接受友人邀請，到認識森丑之助，以至於透過官方權力通行於「蕃地」之間，看似偶然的旅行契機，其實在友人極力邀約的同時，就已經進入殖民者所建構的旅行機制。日本統治台灣以後，殖民地被開發為日本國民旅行或開墾的新天地。友人東熙市來台灣工作，乃至勸誘佐藤到台灣觀光，都和官方運作下的殖民地開發政策有密切關係。對於日本人來說，早期在台的旅遊活動較具有「探險」的意味，例如人類學者的田野踏查。隨著日本統治地位的鞏固，「探險」活動也轉向旅行與觀光的性質⁴³。殖民地的旅行觀光，是促使日本人與全世界「觀看」日本殖民成功的管道，「殖民地」作為一個被展示統治成果的景點，也是在這樣的政治脈絡下逐步建構而成的。當公共體制（殖民政府）、學術調查（人類學者）、旅行書寫（日人作家）等等，都加入建構殖民地形象的權力機制，那麼，在殖民者書寫中所出現的殖民地論述，其實是被一整組力量所框架的再現系統⁴⁴。誠如薩伊德所說的，沒有任何觀點可以比社會系統本身更能

⁴¹ 同上註，頁 6。本段文字為佐藤春夫的〈再版本霧社序〉，轉引自何原功的論文。

⁴² 《霧社》再版將〈殖民地之旅〉刪除，換上〈蝗蟲的大旅行〉、〈鷹爪花〉、〈社寮島旅情記〉。因此，再版的版本中除了〈女誠扇綺譚〉、〈鷹爪花〉之外，其餘各篇都和「蕃地」旅行有關。

⁴³ 請參閱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 385。

⁴⁴ 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著，王淑燕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 年 9 月初版，頁 299-303。

對其領域實行全盤之霸權⁴⁵。

在森丑之助的導覽下，佐藤春夫的旅行書寫，誠然是把台灣當做一個巨大的博物館。殖民者的統治技術，是經由知識累積而成的文化工程，比武力征服更能在殖民地內通行無阻。他們運用史料編纂的模式、數據的模式、旅行觀察的模式、博物學的模式、監視的模式去探索殖民地，因而被殖民者的日常細節與各類統計數字皆巨細靡遺地呈現出來。這些型態的成果包括了出版報告、文獻、統治數字、方志、地方律令、百科全書等等。佐藤春夫是日本來台作家中，建立旅行文學的典範者。他的台灣旅行書寫，就是建立在博物館學式的觀看方式，以抽樣性風景來取代台灣的全部。這種觀看方式，誠然不只佐藤春夫一人而已，上一章提過的中村古峽，有更為偏頗的傾向，他直言對台灣「蕃地」的興趣，所到之處都跨入台灣內部的風景。中村古峽履及的蠻荒地方，在 1910 年代都並非旅行制度化的景點。推動他走完全程的動機，已非單純的旅行樂趣，還有一種拓荒者或文明者的冒險精神與知識探索。

基本上，佐藤春夫在台灣旅行書寫，還是以異國情趣為主調。他偏愛台灣南方的頹廢步調，或是原住民部落的自然風情，都和日本國內的文化語境大異其趣。日本作家的異國情調文學，不僅在於強調文化內涵的不同，更指涉了文化位階的高低。儘管殖民者標榜同化政策、殖民地現代性，都無法改變作家在創作中所強調的「異化」或「頹廢化」景物。通過閱讀佐藤春夫的作品，台灣／殖民地的意象顯然被某些隱喻所纏繞。佐藤春夫在小說〈女誠扇綺譚〉中以「荒廢美」的趣味來營造台灣的異國情調，透過小說的文本語境，再現的台灣可說是緩滯且失去生命力⁴⁶。佐藤在〈天上聖母〉對台灣媽祖信仰的詮釋，傾向於將媽祖與紅毛、南蠻聯想在一起，讓殖民地瀰漫著一股奇異的本土宗教氛圍。而在〈霧社〉這篇遊記當中，原住民女性則有兩極化的形象。一方面，她們有如天真無垢的可愛孩童，讓作者湧起和小狗相處般的親愛之情。另一方面，她們卻展現了肉體魅力與原始野性，將主角陷入慾望與理性的拉扯。

野性的呼喚，促使佐藤春夫跋涉到原住民部落去遊覽，但是在〈霧社〉、〈日月潭遊記〉、〈旅人〉等作品中卻展現了他對原住民的辯證思維，也流露出進步與荒廢、文明與野蠻的東方主義式的視線。文明與野蠻之間的優劣位階，不僅是〈旅人〉、〈霧社〉這兩篇作品中的重要對比，也是作者內心自我辯證的苦惱問題。因此，他才會在〈殖民地之旅〉中傳達台灣居民對殖民政策的否定認同，也

⁴⁵ 愛德華·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2001 年 1 月初版，頁 332。

⁴⁶ 關於佐藤春夫對台灣的「荒廢美」隱喻，請參閱〈荒廢美的系譜——試探佐藤春夫「女誠扇綺譚」與西川滿「赤崁記」〉，《文學與社會學術研討會：2004 青年文學會議論文集》，台南市：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年 12 月，頁 139-164。修改後收入本論文第五章第二節。

展現一定程度的人道關懷。所謂殖民地的隱喻，乃是指佐藤春夫對台灣的文化詮釋，而這樣的詮釋也衍生出作者對台灣的誤讀與歧見。透過這些隱喻所蘊含的意義，我們可以對他的台灣相關作品進行再詮釋。佐藤的書寫顯示，凡是他在台灣旅行走過的地方，也正是他建構帝國知識之處，更是帝國權力延續伸張的表徵。佐藤春夫所營造的帝國文本，在後殖民理論盛行的今天，仍然具有豐富的、無窮的文化暗示。



表一：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目錄

篇名	發表刊物	發表日期
日月潭に遊ぶ記(日月潭遊記)	《改造》第3卷第8號	1921年(大正10)7月
蝗蟲の大旅行(蝗蟲的大旅行)	《童話》第2年第9號	1921年(大正10)9月
鷹爪花(鷹爪花)	《中央公論》第38年第9號	1923年(大正12)8月
魔鳥(魔鳥)	《中央公論》第38卷第11號	1923年(大正12)10月
旅びと(旅人)	《新潮》第40卷第6號	1924年(大正13)6月
霧社(霧社)	《改造》第7卷第3號	1925年(大正14)3月
女誠扇綺談(女誠扇綺譚)	《女性》第7卷第5號	1925年(大正14)5月
天上聖母のこと(天上聖母)	《三田文學》第1卷第6號	1926年(大正15)9月
日章旗の下に(太陽旗之下)	《女性》第13卷第1號	1928年(昭和3)1月
殖民地の旅(殖民地之旅)	《中央公論》第47卷第9-10號	1932年(昭和7)9、10月
かの一夏の記(彼夏之記)	作品集《霧社》跋文	1936年(昭和11)7月
社寮島旅情記(社寮島旅情記)	《文學》第5卷第8號	1937年(昭和12)8月

資料來源：佐藤春夫，《定本佐藤春夫全集》，京都市：臨川書店，1999~2000年。

表二：森丑之助所提供的旅行日程(預定)表

日期	日程
9月8日	打狗出發 宿嘉義(飯店) 嘉義附近 參觀北港媽祖宮 訪問營林所(聯絡阿里山登山事宜)
9月9日	嘉義出發 宿交力坪或奮起湖
9月10日	抵達阿里山 停宿一晚(泊於阿里山事務所官舍)
9月11日	滯留阿里山 視察附近山林 遠眺新高山
9月12日	阿里山出發下山 途中宿一晚
9月13日	嘉義出發 宿日月潭(涵碧樓)在嘉義搭乘頭班車至二水換車。在湳仔轉搭輕便鐵路，從新年庄起步行約十町。
9月14日	日月潭出發 宿埔里社(日月館)。參觀日月潭附近，午後出發，從新年庄到埔里社為輕便鐵路。
9月15日	宿霧社(霧岡俱樂部)上午赴抵霧社，下午視察附近蕃社。
9月16日	霧社出發 宿能高山(泊於駐在所宿舍)能高山是中央山脈這帶山區的尖峰，標高一萬千尺，道路狀況良好，宿舍設備比較完善。
9月17日	能高山出發 宿埔里社(日月館)
9月18日	埔里社出發 宿彰化(彰化飯店)
9月19日	參觀鹿港 宿台中(春田館)
9月20日	參觀台中 搭夜車往台北

資料來源：佐藤春夫，《かの一夏の記》(彼夏之記)，《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年(昭和11)年7月發行。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霧社》，(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台灣編】5)，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發行，頁258-259。

第二節 朝向南方的旅途：1920 年佐藤春夫的台灣與中國

一、引言

佐藤春夫發表的閩台旅行作品當中，以紀行而論，台灣書寫顯然占了多篇，福建方面較具份量則是《南方紀行：廈門採訪冊》⁴⁷。作者在創作生涯中曾多次表示 1920 年是一趟成功之旅，並強調在台灣獲得快適的旅行心情。相形之下，福建之旅顯得黯然失色許多。上一節的討論，已經對台灣紀行有初步研究。如果想要周延瞭解佐藤春夫的南方體驗，有必要進一步探討他的中國福建相關作品，藉由《南方紀行》所展現的文化視域，足以視為日人作家在南方憧憬的樣本，也可窺探佐藤春夫對二十世紀初中國的認識論。

《南方紀行》一書由六篇文章所構成，分別是〈廈門的印象〉、〈章美雪女士之墓〉、〈集美學校〉、〈鷺江的月光〉、〈漳洲〉、〈朱雨亭的事與其他〉⁴⁸。從出發之際的陰霾天氣開啟文章序幕，似乎為這趟旅行埋下伏筆。透過台灣與福建紀行的對置比並，鮮明反映佐藤春夫的兩地旅興有頗大差距，文章脈絡也呈現了相當殊異的風情與心情，可以強烈感觸到旅者的心境寫照。他的作品會浮現出這種現象，必須要追溯歷史原因才能釐清情況。在 1920 年之前，中日間因為政治局勢已出現非常緊張的氣氛。毫無疑問的，這和日本對中國所進行的帝國侵略有關。1915 年「二十一條約」⁴⁹，1919 年的山東問題⁵⁰，都激起中國

⁴⁷ 1920 年的中國相關作品，除了《南方紀行：廈門採訪冊》，另外還有小說〈黃五娘〉，《改造》，1921 年 1 月，後來修改成〈星〉刊載在同年 3 月的《改造》；雜文〈廈門のはなし〉（話說廈門），《改造》，1937 年 12 月。〈星〉的靈感是佐藤春夫在旅行途中，在廈門的客棧透過一位台灣人轉述給他聽的中國地方性傳說，故事紙本為清朝的小說《荔鏡傳》。這個傳說當時也流傳到台灣，成為民間很受歡迎的戲劇「陳三五娘」。不過〈星〉是佐藤春夫的創作，內容和《荔鏡傳》不盡相同。他另外也寫過名為〈荔鏡伝〉的作品，收入《むささびの冊子》（鼯鼠的冊子），京都：人文書院，1937 年（昭和 12）。關於佐藤春夫作品〈星〉之研究，可參閱黃美慧，〈佐藤春夫と台湾・中国——「星」と「陳三五娘」の比較研究〉，《台灣文學研究會會報》，17-19 合併號，1992 年 6 月，頁 237-257。

⁴⁸ 佐藤春夫，〈廈門的印象〉（廈門の印象）、〈章美雪女士之墓〉、〈集美學校〉、〈鷺江的月光〉（鷺江の月明）、〈漳洲〉、〈朱雨亭的事與其他〉（朱雨亭のこと、その他），收入《南方紀行》，東京：新潮社，1922 年（大正 11）4 月 20 日發行。書前還有〈小引〉和一張「漳廈地方略圖」。另外，篇名全為漢字的部分就不再附錄原題。

⁴⁹ 「二十一條約」簽定於 1915 年 5 月，是中國近代的不平等條約之一。1915 年 1 月，日本公使日置益向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直接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並要求中國絕對保密。1 月至 4 月，袁世凱一方面命令外交部跟日本談判，一方面暗中逐步洩露內容，希望能獲得英美支持抗衡日本。在談判過程中，中國的談判代表多次拒絕要求的部份內容，迫使日本作出讓步，中國國內亦出現反日情緒，而日本則以武力威脅中國。到了 5 月 7 日，日本政府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限令於 9

人的反日態度。佐藤春夫在廈門街上牆壁所看到的標語「青島問題普天共憤」、「勿忘國恥」，或是抵制日貨的「勿用仇貨」、「禁用劣貨」⁵¹。這些文字讓他見識到當時中國人的排日行動，也讓他的旅遊心情受到衝擊。而他在福建旅遊的嚮導，是友人東熙市的門生「鄭」，鄭氏是一位不會說日語的廈門人，兩人只好以簡單的英語溝通。眾所周知，佐藤春夫的漢文素養極深，對中國文學也抱持相當情趣，甚至從事翻譯中國經典以介紹給日本讀者。不過，他並不會說中國的普通話，更遑論是福建等地的閩南語。在異國旅行的經驗當中，語言障礙是頗為常見的問題。但是只能「看」不能「說」的佐藤春夫，在舉目「反日」的文字之下，在複雜的異國情調之外，更會產生強烈的疏離感。

佐藤在台灣行程，充分得到人情的協助。但是到對岸福建的旅行期間，一方面因為中國人的抗日情緒，一方面由於語言隔閡以及文化落差，甚至隨行旅伴的疏忽，讓他顯感受到客居異鄉的寂寥與不安。此外，1920年代的台灣與中國，不論在政治或民情已呈現差異性的文化內涵。當時台灣已接受日本統治達到四分之一世紀，在淪為殖民地之後，台灣人的文化認同縱使出現兩難的抉擇，但是相當明顯的，台灣社會正在快速地邁向文明化，日本文化與語言使用方面也漸趨成熟。至於對岸中國福建，正值粵桂兩軍開戰前夕⁵²，又面臨東洋與西洋強國的覬覦，內憂與外患交攻，局勢到處動盪不安，沿岸各地漫漶著人心惶惶的氣氛。

1920年代的亞洲，是一個劇烈變動的時刻，台灣與中國，誠然有著不一樣的命運。佐藤春夫再現的風景與心境，也映襯出自然與文明的辯證思維，其中更指涉了日本文人的東亞概念。台灣在最近十年陸續出現佐藤春夫在台灣相關作品研究⁵³，但是同時期的福建紀行卻多被忽略⁵⁴。反日情緒與語言障礙，確實

日前答覆。最終袁世凱政府在5月9日晚上11時接受二十一條的一至四號要求，並於5月25日完成簽字。5月9日被全國教育聯合會定為國恥日，稱「五九國恥」。

⁵⁰ 「山東問題」發生在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屬於戰勝國的中國，卻被日本政府要求割讓中國山東領土之部分主權。1919年，戰勝國之一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參加巴黎和會，會上日本政府卻要求以戰勝國的身份接管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一切權益。代表團員之一的顧維鈞，為此準備了《山東問題說帖》，力陳中國不能放棄孔子的誕生地山東，猶如基督徒不能放棄聖地耶路撒冷，震撼歐美代表，扭轉了輿論形勢並博取列強同情。但是後來由於義大利退出和會，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脅會生效而導致和會流產，於是依日本要求，將德國之山東權益割讓給日本。此時中國代表團團長陸徵祥離開巴黎。因此顧維鈞實際上暫代團長職權，在他的主持下，中國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山東問題直至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才由美國調停下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日本將山東及膠濟鐵路歸還中國，中國則開放當地為商埠，並提供日本僑民在當地的一些權益。

⁵¹ 佐藤春夫，〈廈門的印象〉（廈門の印象），《南方紀行》，東京：新潮社，1922年（大正11），頁31。

⁵² 是舊桂系軍閥陸榮廷，與效忠孫中山、由陳炯明所指揮的粵軍，在1920年至1921年之間爆發的一場戰爭。主要作戰的地域為廣東，廣西兩省。

⁵³ 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逐漸引起討論，應該與中譯本《殖民地之旅》（邱若山譯，台北：草根

是閩行的最大問題，但是本節亟欲凸顯嚮導者的引導位置，透過引路人的性格特質與行動指引，旅行者的觀看角度也隨之轉移。嚮導者與旅行者之間的微妙牽絆，涉及台灣的殖民性、中國的國民性問題。從而進一步以現代性與殖民性的雙重角度來觀察，更能深刻理解佐藤春夫的第一次東亞體驗。雖然本論文是以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為中心，但是如果只單純探討佐藤春夫 1920 年代旅行的台灣而不談論中國，誠然無法周延分析佐藤春夫文學中的南方與東亞。以觀光為前提的近代旅行，嚮導者（guide）是旅行的指標性人物，「觀看」行為則是最重要的目的，這也指涉旅行者的現代性視域。本節試圖以東亞現代性的文化角度來對照兩地旅行殊異，希冀能夠釐清佐藤春夫在帝國文化脈絡與南方觀點的發言位置。

二、引路的人：成功之旅的關鍵

1920 年（大正 9）暮春季節，也是佐藤春夫 28 歲時，他因為情事抑鬱難解，陷入極度神經衰弱的身心困境，遂想念起久違的家園而返回故鄉。當時已有妻室的佐藤春夫，愛上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妻子千代⁵⁵。辛苦戀情讓佐藤春夫飽受精神

文化，2002 年）問世有密切關係。

⁵⁴ 在中文方面，目前僅知 1992 年黃美慧提出一篇論文〈佐藤春夫與台灣中國：大正九年的台福之旅〉對比兩地之旅，《東海學報》，第 33 卷，1992 年 6 月，頁 167-183。該論文介紹佐藤春夫在 1920 年的台閩之旅，並歸納兩地旅途差異的四點理由：「（1）台灣是當時日本的殖民地，讓佐藤春夫有一種國外旅行的安全感。而福建讓他感到身為外國旅客的不安。（2）台灣之旅大致上有人安排，在旅行各地又都有保護者。福建之旅則大致由他自己計畫，又沒什麼保護者。（3）在台灣無論是嚮導或訪問地的人，幾乎都用日語。而福建的嚮導用英語，訪問地用日語也不太通。（4）一般台灣人喜歡和內地人（日本人），尤其佐藤春夫訪問的文人墨客都很喜歡文學家的他。相對的，福建反日情緒非常高昂，而且兵火不絕下，很少有人能理解佐藤春夫。」另外，姚巧梅則以日文發表了《南方紀行》的研究〈佐藤春夫文学における中国・福建の位置——『南方紀行』を中心に〉（在佐藤春夫文學上中國・福建的地位——以『南方紀行』為中心），《皇學館論叢》，第 38 卷第 2 号，2005 年 4 月，頁 52-68。碩士論文方面則有陳志堅，《佐藤春夫之閩南文學》，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年。

⁵⁵ 這段波折的感情，折磨佐藤春夫長達十年，到 1930 年才有了結果。中間的過程，就是著名的「小田原事件」和「讓妻事件」。佐藤春夫和谷崎潤一郎相交，是在 1917 年（大正 6）的夏天，也因此結識其夫人千代。千代是一位溫柔典雅的女性，但並非谷崎潤一郎喜愛的類型。後來谷崎迷戀千代的妹妹せいこ，兩人同居不歸。這段期間佐藤春夫開始和千代接近，因為同情而生愛。1920 年前後，佐藤春夫產生鬱結心情，一方面來自他與谷崎千代的戀愛關係，另一方面也和他自身的婚姻問題有關。他在 1920 年 10 月從台灣返回日本不久，就和當時的妻子米谷香代子分手，但是谷崎潤一郎和千代的關係卻沒解決。當初谷崎潤一郎迷戀千代的妹妹時，極力鼓勵佐藤春夫和他太太的戀愛關係，表示願意將妻子讓給佐藤春夫。後來せいこ厭倦谷崎潤一郎而逐漸冷淡，他回家後也開始反悔，不願意佐藤春夫和妻子來往。佐藤春夫一怒之下與谷崎潤一郎絕交，文學史上稱「小田原事件」。小田原事件後的幾年間，佐藤春夫在家鄉與小田中夕ミ結婚，後來也和谷崎潤一郎恢復友情。在 1930 年，他與夕ミ離婚。該年聽說谷崎打算讓千代與其弟子結婚，

折磨，為驅散心中苦悶，促成 1920 年回鄉與旅台的契機。該年春天，他在故鄉遇到中學時代的友人東熙市，佐藤春夫情不自禁地述說了自己的憂鬱，東熙市遂極力慫恿他到有趣的殖民地散心。未見的南國幻影，透過昔日同窗的舌燦蓮花，一幕幕浮現在他眼前。心動的佐藤春夫，倉促之下決定成行，他在〈彼夏之記〉述說到國境之南的動機：

或許有人會說，盛夏的時候，要玩也要看地方，特意到台灣去，可真是好事之徒。沒錯，我是個好奇的人。到暑夏的地方不在炎天去，到北方不在下雪時去，是無法識得其中真趣的。這是我的一貫主張，因此，我自認我的好奇非常合理。（〈彼夏之記〉，頁 340）⁵⁶

這是一種極端的態度，要體驗暑夏，就是要到到南方的台灣才能感受熱度。佐藤春夫的故鄉是和歌山縣新宮市，位於本州的南部，有大海與山脈形成的自然風景，也有溫暖而和煦的陽光以撫慰遊子。然而，台灣是比故鄉更南方的所在，它更是帝國之境的南端。殖民地的熱帶風土，流淌自然原始氣息，相信可以治療他的憂鬱；南方的明亮，也能驅趕心中的晦暗。佐藤春夫被惹起的旅興，有擺脫現實的意味，進入幻想中的南方。憂鬱的現代病徵，唯有回歸自然才得以紓解，這可能是佐藤春夫潛意識下的想法，也指涉現代人的文明反思與南方憧憬。他以「好奇」做為單純的動機，其實內心世界有更深的期待。而在當時，他的家人也透過行動支持：「老爸為了防患瘧疾，特別準備了奎寧丸塞在我的行李中，老母儘管總為線穿不過針孔所苦，還是挑燈緊急為我縫製麻質的衣物，忙得團團轉。」（〈彼夏之記〉，頁 340）已近而立之年的佐藤春夫，在身心安頓上還是仰賴父母。雖然文章裡面並沒有提到父母如何看待兒子的戀情，透過這一段文字，卻可以看到他們對子女的無怨情感，他們竭盡為兒子考量，細心準備旅行所需的藥品衣物，包括旅費都是由他的父親所支付⁵⁷。佐藤春夫生在醫生之家，父祖之輩在新宮頗有名氣。但是在旅台之際他頻頻自稱是貧窮文人，源於他的旅費還是依靠父親贊助。

因為 1920 年的旅行，佐藤春夫留下一連串相關作品，為讀者攜來無限想像。

前來商談，結果由弟子退出，佐藤春夫決意和千代結婚。1930 年 8 月 19 日，佐藤春夫、千代和谷崎潤一郎三人聯名在《朝日新聞》上發表公開信：谷崎潤一郎與千代離婚、孩子鮎子和母親一同生活、千代與佐藤春夫結婚，這就是著名的「讓妻事件」。

⁵⁶ 本節台灣相關作品之中譯本係引用邱若山譯，《殖民地之旅》，台北：草根文化，2002 年 9 月初版。如再引用中譯本部份，只於引文後附上頁數。關於各文之原出處，請參閱本章附錄一：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目錄。

⁵⁷ 關於旅費的部分，柳本通彥在探討佐藤春夫與森丑之助的交往關係時提過，請參閱柳本通彥，《明治冒險科学者たち》，：東京，新潮社，2005 年 3 月，頁 172-173。

如果以佐藤春夫的立場，這是一次意外的旅行，他的收穫是什麼？在心情上是否得到振作？以他晚年的話來回答是「完全幸福的一夏」⁵⁸。在 1960 年代的回憶性文章〈詩文半世紀〉中重提四十年前的旅行，他的記憶還殘存多少，實在令人猜疑。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他選擇保留了美好的印象。這應該要歸功於一位人物，那就是森丑之助。南方暑夏的熱氣，森丑之助的熱情，都在他心中烙下深刻記憶。佐藤春夫的台灣行程多半來自森丑之助企畫，前往福建地方也是由於森氏的建議。但是他在兩地的旅情卻有極大落差，相對於殖民地的愉快印象，福建之行則充滿危機感。探究其原因，人事物的協調與否，關乎佐藤春夫的旅行興致。單純從風景的角度來看，台灣和廈門各有其趣，也自有獨特的異國情調，這是佐藤春夫頗為讚賞的部分。而以亞洲的時勢而論，1920 年代日本對中國正是蓄勢待發，福建地方的反日情緒，也在佐藤春夫意料之中。閩台旅行的最大關鍵，還是在於「人」的部分。因為嚮導者的指南方式，旅行者的目光畛域也會有所不同。森丑之助以人類學者的導覽觀點，向佐藤春夫詳盡介紹台灣景點的「可」看之處。對他而言，森丑之助不僅是一位優秀的嚮導者，也是人格值得尊敬的人物：

說到丙牛，歲數也許是比我大上二輪的丑歲出生的。是大約這般年齡、溫和平穩的中老年紳士。後來聽說，在日清戰爭時缺乏南京官語口譯的人，所以他因此從軍。戰後領台的同時，他來到這個島上，以蕃人研究為志業。他說話有京都的腔調，一隻腳好像有殘疾而跛行，卻是一位人不可貌相的豪傑，身無寸鐵而縱橫蕃山，是蕃人們口中被稱為「日本的酋長」的人物。⁵⁹

兩人在初識之際，佐藤春夫 28 歲，森丑之助 43 歲，當時僅相差 15 歲，也就是一輪多而已。佐藤春夫顯然誤判了森丑之助的年齡，也有可能是森丑之助的成長經驗與人格氣質使他更具老練外貌⁶⁰。根據楊南郡譯著《生蕃行腳——森丑之助的台灣探險》的介紹，森丑之助在生命履歷上，確實展現不凡身段。1877 年（明治 10）出生於京都的森丑之助，是家中次子。由於長男亡故，使他成為獨子而受到過度照顧與保護。十六歲時為了逃避家庭束縛而輟學離家，決心不帶

⁵⁸ 此話出自〈詩文半世紀〉，原刊於《読売新聞》，1963 年 1 月 4 日-5 月 1 日，共 75 回。本引文係參考《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 18 卷）所收之底本，頁 108。

⁵⁹ 佐藤春夫，〈詩文半世紀〉，原刊於《読売新聞》，1963 年 1 月 4 日-5 月 1 日，共 75 回。本引文係參考《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 18 卷，頁 108）所收入之底本而翻譯。

⁶⁰ 柳本通彦，〈第三章 「蕃人」に一生を捧げた人類学者森丑之助〉（為「蕃人」奉獻一生的人類学者森丑之助），《明治冒險科学者たち》（明治冒險科學家們），東京：新潮社，2005 年 3 月，頁 174。

分文地到外地流浪。這時候適逢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本軍方亟需一批中文通譯派往中國戰區，曾經自修中國南方官話的森丑之助，雖然僅略通皮毛，也被錄用準備派往遼東半島服役。然而戰爭很快結束，當時日本經由馬關條約獲得台灣，嚮往浪跡天涯的森丑之助，立刻提出派往台灣的申請書，來到他幼年時即聽聞：「有鬼魅一般可怕的生蕃居住的熱帶島國。」他初到台灣之時，還是個充滿浪漫幻想的懵懂少年，因為公務進入「蕃地」引發好奇心，後來決定傾注心力於台灣全島「蕃地」的調查研究⁶¹。他的南方憧憬，從幻想而起，逐步透過實踐，完成自我的理想追求。

森丑之助並非人類學背景出身的研究者，為了實踐自己的志趣，他憑藉著過人毅力，一一扭轉他在客觀條件上的種種劣勢。首先，他努力學習各個原住民的語言，短短一年多的時間內，即精通各族語言。而為了學習植物方面的知識，森丑之助特別住進植物學家小西成章的宿舍，隨同他深入前人足跡未至之地，調查地圖上尚待勘查的山川形勢與森林植物分布。在人類學方面，則陪同人類學者鳥居龍藏進行多次冒險犯難的調查行動，如玉山主峰的首登、清代八通關古道的沿線部落訪查，以及學習調查方法與攝影技術。此外，他更懇勤與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權威坪井正五郎教授通信，郵寄各種考古人類學的調查成果與標本給坪井博士，而坪井博士也深愛這位熱情好學的學生，不但毫無保留地傳授他考古與人類學專業學識，更寄贈許多調查用器材，協助他進行調查研究。在馘首習俗盛行的山區，森丑之助平時行動並沒有軍警隨行保護，甚至連防身武器也不帶，他所倚仗的就是誠心而已⁶²。

不論是人種或是植物調查，人類學者與植物專家進行的實地勘查，都在於形塑一套龐大專業的台灣學，將所有未名或未明的，一一清晰定位。這是屬於現代學術的領域，也是冒險犯難的工作，他們雖然多為接受台灣總督府的協助或請託，在台灣史上卻是較有正面評價的一群日籍人士。他們發現台灣，探索台灣，很多台灣生物都留下他們的命名。他們與軍事占領的路線不同，是透過親身踏履征服台灣的天涯海角。台灣作為學術的對象，透過各種調查、分類、統計，他們成為台灣學專家。這一切都建立在先驅學者的學術權威之上，無疑也是帝國權力的一部分。他們累積性的視野塑造了一個「真實」的台灣。如何評估這些專家的歷史功過，涉及到理性的迷思，帝國的欲望。森丑之助能夠逐漸引起台灣學界的矚目，除了殖民者身分所挾帶的文明手段，他對台灣原住民的感性部分更是吸引

⁶¹ 請參閱楊南郡，〈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收入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學術丑之助的台灣探險》，台北：遠流出版，2000年1月初版，頁29-31。

⁶² 楊南郡，〈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收入森丑之助原著，楊南郡譯註，《生蕃行腳：森學術丑之助的台灣探險》，頁32-34。

研究者目光。

森丑之助以豪邁性格贏得「蕃人」認同，投入畢生心力去體驗最初的南方憧憬。佐藤春夫在返日之前，曾經滯留森丑之助家中近半個月之久，受到家族般的接待，令他樂不思蜀。兩人相處的時光中，佐藤春夫應該感受到森丑之助對於台灣研究的熱忱，也可以推測他的台灣認識，甚至是「蕃地」與「蕃人」的文化觀察，都來自森丑之助影響頗深。台灣旅行在精神上，賦予佐藤春夫重新創作的欲望，因此他無法忘記台灣和森丑之助。縱使在成名之後，他對森丑之助始終抱持極大敬意，不但常常在文章中提及「森先生」，兩人也一直保持往來。森丑之助 1926 年（大正 15）去世前的 5 月份，他還在東京的佐藤春夫家中滯留一個月左右。纖細敏感如佐藤春夫，在森丑之助臨死之前，也沒有察覺到友人的異狀，因此在接到森丑之助的死訊大感意外⁶³。雖然兩人的緣分只有六年，在佐藤春夫的心目中，森丑之助是一位無法忘懷的非凡人物，才會在文章中不斷召喚自己的記憶。

1920 年的殖民地之旅，佐藤春夫相當愉快。當時森丑之助因為腳疾問題，無法親自陪伴佐藤春夫而至感遺憾⁶⁴。但是透過他的關係，沿途都有通譯者與腳夫照料，食宿也不需花費，等於官員級的禮遇。他在多篇台灣相關作品都得意提起這段經歷：

他們為我準備的乃是所謂的椅轎。說來，乃是用只有椅背和扶手而沒有腳的藤椅。從兩側插過棍子，由兩個苦力分別扛著兩根棍子前後兩端的東西。為了讓坐著的人可以放腳，以繩子垂掛一根細木片，我乃用力地把腳緊縮在那木片上。然後把兩臂放在扶手上。沒有遮目蓬，所以撐開了洋傘。這椅轎，坐來頗不是愉快的。但，聽他們說若不用椅轎，一般的輿轎是無法爬上這樣的坡道的。看來並不常有人搭轎子，走出集集街道時，人們都朝著我看。我們一行，有兩個抬轎的苦力，還有一個是當抬著的其中一人疲累時隨時準備輪替的苦力。加上打從

⁶³ 請參閱柳本通彥，《明治冒險科学者たち》，東京：新潮社，2005 年，頁 172-186。森丑之助由於工作、人際關係等諸事不順遂，1926 年 7 月在坐船返日途中投海自殺，享年 49 歲。據柳本通彥推斷，森丑之助工作室因為 1923 年關東大地震而引起火災，將他近 30 年的台灣原住民研究資料全部付之一炬。他本來將這些資料帶回日本，是想要在日本重新出版，遭此意外打擊，等於把他一生的努力全部銷毀。森丑之助如何克服這個打擊，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半並沒有留下任何相關文字。森丑之助在 1926 年 7 月初失蹤，後來才傳出他自殺的消息，當時台北在傳聞他是為了女性關係自殺。不過後來的研究資料顯示，森丑之助會選擇絕路，其實和他計畫建設原住民村的「理蕃」事業不能如願進行有極大關聯。

⁶⁴ 在森丑之助於 1920 年 7 月 17 日寫給佐藤春夫的信當中，除了詳細介紹中部山區的景點之外，也說明他因為腳部的神經痛問題，無法親自為佐藤春夫導覽沿途風景，感到相當遺憾。請參閱新宮市佐藤春夫記念館編集，《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和歌山縣：新宮市佐藤春夫記念館，2003 年 3 月 20 日發行，頁 4-5。

昨天就一直招待我的那位中年紳士——聽說是電力公司的這個工程的監督——以及另外一個負責拿所有的人的便當和茶水的年輕人。有這麼一大群隨從跟著，大概可以想像我有多神氣吧。（〈日月潭遊記〉，頁 62）

佐藤春夫所描述的，就是在第二章討論中被作家中村古峽稱為「無聊東西」的交通工具。除了兩個轎夫之外，前後還有五個人簇擁，只有佐藤春夫獨自高坐於轎上。這是多麼風光的畫面，唯一感到美中不足的，是自己的人品及風貌實在沒有官員的架勢。他的身材單薄而削瘦，身上衣著已經因為長途跋涉而濕黏地沾滿汗漬，帽子因為是粗俗品，帽沿早已歪皺不堪。而且這種轎子，坦白說並不舒服，必須一段時間適應，才能讓身體配合它的搖晃。在〈日月潭遊記〉和〈旅人〉，重覆記載了這段經歷，顯然讓作者印象深刻。尤其隨行的人當中，還有電力公司派遣的日籍職員；不同的路段，由不同的監督接待。後來他遇到了一位健談之士，他來台灣已經二十年以上，有關名勝古蹟、山川風光、或是道路花草樹木，各種問題都能詳盡地回答。親切無礙的交談，在不知不覺當中兩人已經如同結伴而行的旅人。對佐藤春夫而言，回憶殖民地實在是太有趣了，有情投意合的旅伴相隨，不僅沒有語言上的困擾，還能到處品味異國情調。透過森丑之助的導覽，他看到許多異於日常經驗的事物，尤其是台灣原住民部落的「野趣」。

相較於佐藤春夫，1913 年來台灣的中村古峽，兩人雖然都是來自日本民間的文人，但是所獲致的待遇有則頗大落差。對台灣「蕃地」也抱持極大興趣的中村古峽，關於前往台灣的動機，是單純旅行或是尋找創作材料？並未留下說明文字。確知的是，在出發之際，他就發願要看到台灣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雖然沿途也有各地官府警力的協助，但是他的旅行方式較為克難，有許多景點是利用雙腳跋涉，他的旅行條件顯然低於佐藤春夫，也甚少出現抒情般的心情書寫，而多是沿途風景的寫實紀錄。佐藤春夫的成功之旅，總而言之要歸功於森丑之助的人脈⁶⁵。在「野趣」之餘，佐藤春夫的原住民體驗，還加入了森丑之助的情感，因此他將 1920 年的旅行稱為「完全幸福的一夏」。森丑之助對於殖民者當局的「理蕃」政策頗多微詞，也亟欲改造原住民的生活條件。這些幽微思考，或多或少也傳遞給佐藤春夫。儘管佐藤春夫無法避免以文明者的姿態凝視原住民，但是在他的作品當中，可以看出一些溫情思維。引路人的行動指引，能夠影響旅行者的觀看角度。嚮導者與旅行者之間的微妙牽絆，就在於此。

⁶⁵ 中村古峽來台的 1913 年，森丑之助遇到一些問題，決心離開台灣返回東京。令人好奇的是，如果中村古峽與森丑之助碰面，或許中村古峽的作品會出現不一樣的台灣原住民風貌。

三、共感的界限：佐藤春夫的中國初體驗

佐藤春夫在 1920 年 7 月抵達基隆之後，隨即就到台北與森丑之助會面⁶⁶。但是「因打算日後再來，也就先做南下計。」（〈彼夏之記〉，頁 341）所以並未在台北停留，當天傍晚隨即搭乘台北出發的火車，直驅友人東熙市位於高雄住所，在南部滯留了兩個星期，過著悠哉的生活。當時，森丑之助很關心他的旅行狀況，再三來信推薦行程⁶⁷。因為 7、8 兩月也是台灣的颱風季，森丑之助考量到天候問題會影響旅行品質，他向佐藤春夫提出建議：

丙牛先生給我一個提案：這般閒散的話，乾脆到對岸地方去看看怎麼樣？所謂的對岸地方，是指廈門、泉州一帶。搭汽船，一個晚上就能橫渡台灣海峽到那裡。想想以後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再來這裡，順便走一趟看看也好，也就遊意頓生了。總之，好像已經看開了，變得較積極了。說不定這是風土的影響使然呢？（〈彼夏之記〉，頁 343）

所謂「風土的影響」，應該是指樂觀的態度。台灣的熱帶風，把胸中沉鬱吹散，讓他轉換了好心情，也使他產生更大的旅心。但是，當時中國沿岸的局勢並不平靜，森丑之助提出建議時應該有考量到這種情況。不過，這也是他們趣味相投之處，兩人的性格裡顯然都有強烈的南方憧憬。森丑之助和南方結緣，源於他在少年時期學習中國南方官話的經驗，才使他後來成為陸軍通譯進而到台灣。佐藤春夫對於中國也有濃厚興趣，他的亞洲認識是以傳統文明為主的中國。1920 年代處於巨變中的近代中國，誠然不是佐藤春夫所熟悉的。不過在半好奇半冒險的遊興驅使之下，他還是立即接受森丑之助的建議。該年夏季，佐藤春夫趁機到福建地方十數天，是從 7 月中旬到 8 月上旬的事情。1922 年出版的《南方紀行：廈門採訪冊》，細膩記錄了他的中國初體驗，也可以視為是他對二十世紀中國的近距離觀察。

然而，能令他立刻成行的背景，應該也和東熙市的門生「鄭」有密切關聯。《南方紀行》的開端，佐藤春夫用簡單幾句話交代鄭氏的出身：

⁶⁶ 根據邱若山的「佐藤春夫台灣島內旅行日程推定表」，佐藤春夫在 1920 年 6 月底從日本神戶搭船出發到台灣，7 月 6 日抵達基隆，當天到台北和森丑之助碰面後，傍晚隨即前往高雄。佐藤春夫在高雄滯留兩個星期，因為當時正是颱風季，森丑之助建議他前往中國看看。因此佐藤春夫在 7 月 20 日至 8 月 5 日左右，前往中國的福建地方旅行。請參閱《殖民地之旅》，頁 7。

⁶⁷ 請參閱新宮市佐藤春夫紀念館編集，《佐藤春夫宛 森丑之助書簡》，和歌山縣：新宮市佐藤春夫紀念館，2003 年 3 月 20 日發行。

跟我一起來的嚮導，是在這個港口高雄開設牙醫診所的中學時代舊友東君的門生「鄭」。這位青年現在投靠姊姊與姐夫而住在高雄，他是在廈門出生、從廈門中學畢業的人。⁶⁸

佐藤春夫和鄭姓青年顯然是透過東熙市而認識的。《南方紀行》完全沒有提到前往中國之前，兩人在高雄有何交集。廈門人出身的鄭氏，會成為佐藤春夫到福建地方的嚮導，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地緣關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接受東熙市的委託。7月中旬他們從台灣高雄乘船出發渡海到對岸的廈門，在船上遇到鄭氏的友人陳氏，他是來自台南的米商，因為米糧生意經常往返閩台，是一個日語說得很差的台灣人，後來成為投宿廈門的旅伴。

高雄到廈門的航程，需要二十多小時，在船上度過一夜之後，於隔日上午抵達廈門。後來三人一起投宿到當地的客棧「南華大旅社」，他們參觀了旅館的「特等房」。房間相當明亮，因為面向陽台的窗戶敞開著，也由於光線的輔助，讓佐藤春夫清楚看到天花板各角落都掛著蜘蛛網。雖然環境不盡人意，他們還是決定住下。安頓好食宿問題，三人前往銀行兌幣。從銀行回來後，鄭氏隨即準備出門辦事，臨行前跟佐藤春夫交代：「今晚會遲才回來，所以把你的事仔細拜託陳了。」（頁 18）文中清楚記載，鄭氏在下午四點左右離開後，直到晚上六點都沒人搭理佐藤春夫。這是他來到中國的第一天，獨自一人被留在客棧，「陳」也不見蹤影，實在難以排遣寂寞與不安的心情。他決定去探探陳氏的動靜，發現「陳」好像在房裡睡覺，他只好也回到自己的房間躺下。而當時正是用飯時間，佐藤春夫發現客棧夥計不時探頭進來，肯定是想來詢問點餐的事。夥計也顧慮到房客是一位日本人，言語顯然無法溝通，因此頻繁張望卻徒然而返。佐藤春夫想等陳氏起床，然後一起用餐，可是始終沒有動靜。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他只好硬著頭皮對付再度前來的夥計，用廈門語說出：「飯拿來。」（頁 20）這是他偶然記住的一句話，佐藤春夫知道自己的發音很奇怪，沒有想到竟然奏效，雖然不能詳細溝通，至少夥計瞭解客人想要用餐的意圖，後來果真把飯菜端來。然而食物解決了飢餓，卻無法填滿佐藤春夫的焦慮心情。他為情事而苦，想放浪自己於天涯海角，但是此時此地卻不禁思念起故鄉。

直到八點半過後，陳氏終於出現在佐藤春夫的房間，說了一句：「失禮」。陳氏的日文程度極差，兩人只能用簡單句溝通。從陳氏口中，佐藤春夫才知道「鄭」今晚不會回客棧。這些事情，顯然是「鄭」出門前就告知了：

⁶⁸ 佐藤春夫，《南方紀行》，東京：新潮社，1922年（大正11）4月發行。本文引用《南方紀行》之中譯部分為筆者自譯，此後僅加註頁數。

「鄭」好像把今晚會住在鼓浪嶼的事留話給「陳」。那個晚上「鄭」果然沒回來。雖然獨自一人而不安，卻也因為昨夜以來的疲累而熟睡了。（頁 22）

身為嚮導的鄭氏，並沒有細心意識到佐藤春夫的處境。「鄭」所託之人「陳」似乎也未盡到照顧的責任。在中國的初夜，交織著身心的不安與疲憊，佐藤春夫終於陷入睡眠。直到隔天的下午三點之前，「鄭」都一直未出現。當日的早飯和午飯，佐藤春夫是和陳氏一起進餐，但是陳氏在下午也要出門。在佐藤春夫自忖是否又要被置於孤單的景況時，鄭氏終於現身。一見到佐藤春夫，就叨絮著自己已和朋友會面，也向友人借好此後幾天要暫住的屋子。本來想對「鄭」發脾氣的佐藤，看到他喋喋不休地述說和朋友久別重逢的事，想來是人之常情，也就原諒了「鄭」。那天晚上，鄭氏還帶回兩位朋友，連同陳氏和佐藤春夫共五人，熱鬧地展開晚宴。酒足飯飽之後，竟然又起鬨一同前往歌妓院。敵不過眾人強力邀約，在風雨交加的夜晚，佐藤春夫進入廈門的妓院，展開特殊的體驗：

她們一點也不美，那些歌對我而言不好也不壞，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坐在屋裡一角的床上，橫躺以單手支撐身體。三五個女孩抓起一把瓜子過來，笨拙地用手拿起來啃。他們讓女孩唱歌，聽歌時其她的女人就坐在他們的膝上，我一邊無聊地看著他們。一邊咀嚼著內心泛起的異鄉人心情。——我的表情變嚴肅了吧。結果他們也在意我的事，所以很快就離開那裡踏上歸途。（頁 27-28）

「鄭」與朋友顯然經常涉足聲色場所，也頗沉溺於這種聲色環境。廈門的妓戶，可以同時感受到異國（exotic）與性愛（erotic）情調，幽暗陰濕的角落，流淌著曖昧的色情，但是佐藤春夫卻覺得百無聊賴。那些女人無法引起佐藤春夫的興趣，屬於低級趣味。對於女性，佐藤春夫有文明人的潔癖。在台灣或中國的女性或情色描寫中，不難窺探出他的審美品味。台灣的「蕃女」，有純真與野性的雙重形象，直探作者內心深層的慾望與恐懼。而中國的妓女，既沒有才藝也不具備美貌，令人索然無味。在佐藤春夫心中，自有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位性格文靜，溫柔穩重並且具有高尚美德的大和撫子（やまとなでしこ）⁶⁹。對鄭氏他們來說，逛妓院是很自在的樂事，因為佐藤春夫的存在，使他們無法盡興。在抵達客棧後，他們並沒有解散的模樣。鄭氏送佐藤春夫進入屋裡後才跟他說：

⁶⁹ 大和撫子（やまとなでしこ，yamatonadeshiko）是日本女性的美稱。佐藤春夫當時苦戀的對象谷崎千代，就是具備大和撫子之美的女性。

「你自個睡吧？」

「欸，你呢？」

「我必須出去，因為他們說正在等我。我馬上會回來的。」

「鄭」留下這些話之後，很快就離開了。我今晚又得擔心自己能夠在言語無法溝通的人間睡得著覺嗎？想到這裡就很生氣鄭氏不能體諒人的舉動。（頁 29）

佐藤春夫成為他們的絆腳石，最後被單獨留下。他不禁自問，「鄭」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男人，才會對異鄉遊子做出這種莽撞舉動，把他當成像煙霧一般的存在。「鄭」是他的嚮導，卻缺乏應有的熱情，他的不親切是源自於缺乏幻想力的人格特質吧。總而言之，縱使鄭氏和他沒有語言上的障礙，兩人的心靈也無法契合，因為佐藤春夫是一個幻想力充沛的人。他們之間所存在的隔閡，也絕非僅止於友情的層面，顯然涉及思想的差距，其中更透露出佐藤春夫對於文明與落後的思維。「鄭」回到故鄉廈門之後的行為，已經踰越佐藤春夫所理解的現代人的行為規範與禮儀，肆無忌憚地展現任性的一面。

「鄭」當晚在朋友的邀約下，直到深夜一時半才回去。在這段期間，佐藤春夫感覺自己置身於危險的處境，產生許多被害的妄想。因為他把所有的旅費都交給「鄭」保管，所以身無分文。如果這時有人闖進他的房間，對他作出無理的要求，或是向他索討金錢，他完全無法面對，甚至可能因此惹上殺身之禍。這些不安想像，顯示他對「鄭」的信心崩潰：

我信任「鄭」——這樣相信難以信任的「鄭」，把錢全部託付給他——結果由於言語不通，看來雙方意志顯然完全沒有思考吻合的方法，如果我被殺的話，就這樣把我的屍體投入大海之中，在廈門也全然無法可施吧。⁷⁰

佐藤春夫原本打算信任鄭氏，結果卻發現他是不可信賴之人。如果只看過《南方紀行》，沒有接觸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恐怕無法聯想他所謂「完全幸福的一夏」的定義。在《南方紀行》第一章〈廈門的印象〉，就細數他到廈門之後的忐忑旅情。1915 年「二十一條約」，1919 年的山東問題，都激起中國人的反日態度。佐藤春夫在廈門市街上牆壁所看到的標語「青島問題普天共憤」、

⁷⁰ 佐藤春夫，《南方紀行》，頁 30。

「勿忘國恥」，或是抵制日貨的「勿用仇貨」、「禁用劣貨」⁷¹，這些文字讓他見識到當時中國人的排日行動，也令他的旅遊心情受到衝擊。佐藤春夫漢文素養極深，甚至從事翻譯中國經典以介紹給日本讀者。但是他並不會說中國的普通話，更遑論福建等地的閩南語。雖然佐藤春夫對中國的內憂外患表示同情，然而迫於中日緊張關係，到處張貼的激烈標語也讓他有危機感。初抵廈門的新鮮感，在舉目「反日」的文字之下，就不是單純的異國情調可言，而會產生強烈的隔離感。在廈門的初夜，更因為「鄭」的粗心，使他抱著危疑心情入睡。當初會匆促成行的原因，除了森丑之助的提議之外，舊友東熙市的門生「鄭」是廈門出身，所以才讓他不加考慮就毅然出發。然而，佐藤春夫可能後悔過自己的舉動，因為他想仰靠的嚮導「鄭」，卻帶給他許多困惱。

在《南方紀行》的呈現下，鄭氏的形象頗為負面，是一個讓佐藤春夫無法信賴的人物。作者一再強調兩人的溝通障礙。透過文字脈絡可以發現，作者所謂的障礙，不僅單指語言方面，也有思想層面的問題。因為鄭氏不會說日語，他們是以簡單的英語溝通。在語言之外，鄭氏的人格也受到佐藤春夫質疑，他認為鄭氏沒有體諒異國旅者的同理心。「旅伴」的意義，佐藤春夫在鄭氏身上看不到。第一節「廈門的印象」的主調，細膩地描述了佐藤春夫對鄭氏的不信任。在往後的旅程，「鄭」也陪伴他走過廈門與鼓浪嶼，遊歷到中國南方的絕美景點鷺江。但是作為《南方紀行》的開場白，〈廈門的印象〉所傳達出來的複雜心情，恐怕是令佐藤春夫最印象深刻的。

佐藤春夫返日的翌年，即完成《南方紀行》，這篇作品呈現作者對「鄭」的負面思考，儼然是一個不顧道義，追逐聲色的人。四十年之後，佐藤春夫在1959年發表〈暑旅的回憶〉重新反芻關於鄭氏的記憶⁷²，這篇文章對鄭氏展現了溫情，作者不僅交代他們的結識緣由，也回憶和鄭氏在台灣高雄的過往。透過這篇文章，可以對《南方紀行》的鄭氏形象進行不同面向的觀察：

在朋友的牙科醫院裡，有一位從廈門漂泊至此的鄭姓青年當見習生。
我不太清楚他的詳細狀況，好像是住在旗後，通勤到醫院工作。而且
他有同為牙醫的朋友住在旗後，所以我在鄭的邀約下也常常到旗後

⁷¹ 佐藤春夫，《南方紀行》，頁31。

⁷² 佐藤春夫，〈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暑旅的回憶），該文是連載作品〈羈旅つれづれ草〉（羈旅徒然草）的第3回。〈羈旅つれづれ草〉連載於《世界の旅・日本の旅》，第1號至第13號（第11號休載，共12回），1959年8月1日至1960年8月1日。第3回〈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的發表日期，應該是1959年10月號。後來〈羈旅つれづれ草〉全文收入1961年發行的單行本《望郷の賦》（東京都：修道社），但是總題〈羈旅つれづれ草〉被刪除，而以各回的標題為篇名。本文是參考《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7卷）所收之底本，頁277-282。中文部分為筆者自譯。

去。⁷³

毫無疑問的，文中所提到的鄭姓青年，就是陪同佐藤春夫前往廈門的嚮導。兩人之間的互動，顯示在佐藤春夫抵台初期即已展開，而且看似不錯。佐藤春夫不喜歡乘船，但是在回憶文字中，他想起和鄭氏在晚飯後從高雄搭乘木板船渡海到旗後，將近十分鐘的航程，可說是愉快的乘涼之旅。然後他們登上砲台遺跡，風涼爽地吹著，正適合散步。雜草叢生的廢墟，展現了荒涼的詩趣。旗後的村落，悶熱且擁擠，在這些房子中，有一家是鄭的朋友，到他家拜訪時，他的妻子會做杏仁湯請客。在酷熱的夏天，享用滾燙的杏仁湯，別有一番風味，更能真切感受到暑夏的力量：

總之，所謂夏天的熱飲，宛如在南方艷陽下看火炎樹或夾竹桃；單單看就覺得悶熱濃郁之花，比起清涼的白花更相配、更有快感吧。⁷⁴

熱到極限的夏天，才能稱為真夏。這是佐藤春夫的浪漫性格所致，其中也指涉了他的南方憧憬。佐藤春夫在〈暑旅的回憶〉一再強調，他喜歡夏天。夏天讓他幻想力旺盛，讓他變得有活力。從他的文字可以看出，夏天是南方的轉喻（metonymy），夏天涉及替代南方的重要概念。長年如夏的南方，自然風土具有療養身心的功效。憂鬱的現代病徵，也能透過熱度蒸發殆盡。佐藤春夫把他對南方的情感，移情到台灣。從而，他看待台灣的眼神蘊含著熱情，對轉變中的中國則是維持距離感。其中的差異性，可以透過描寫鄭氏的文字來觀察。佐藤春夫在台灣相關作品中所提到的「鄭」，友情色彩濃厚許多。

〈暑旅的回憶〉關於鄭氏，有生動的紀錄：有一天傍晚，鄭氏邀他去旗後砲台賞月，在賞完月色之後，鄭氏突然試探性的問他：「要不要去看旗後的藝旦？」⁷⁵在好奇心的慫恿之下，佐藤春夫應諾了鄭氏的邀約。鄭氏在得到他的首肯之後，似乎顯得特別亢奮，快步走進一家骯髒的小酒吧。進去之後，開始一個人猛灌啤酒，完全無視佐藤春夫的存在。已有相當醉意的鄭氏，拉住身旁的「藝旦」滔滔不絕地講話。美其名為「藝旦」，在佐藤春夫眼中卻是可怕的女人：「雖說是藝旦，大概是從這附近哪裡拉來店裡的女孩子。全都是像南瓜或冬瓜妖怪似的賣春婦，歌一首也唱不出，只會瞎倒酒而已。」⁷⁶面對這些相貌醜陋女人，「鄭」卻

⁷³ 〈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7卷），頁279。

⁷⁴ 〈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7卷），頁280。

⁷⁵ 文章中是書以漢字「藝者」，但旁邊註記「ゲイトワ」，是福建話發音的「藝旦」。

⁷⁶ 〈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7卷），頁281。

陶醉其中，後來甚至搖搖晃晃走進房間的內室。佐藤春夫以為他去廁所，但久久不見出來。等待期間，他既聽不懂女人們的談話，又不喝酒。實在閒得無聊，往內室一探，才發現「鄭」橫躺在裡面，抱著一個女人，而且兩人大腿重疊相擁。原來是沉溺於性愛之中，難怪始終不見「鄭」的人影。眼前的色情風景，讓燠暑的夜晚更形滯悶了。佐藤春夫快步走出酒吧，想單獨先離開，「鄭」從後面倉促地追趕過來央求他：「今晚的事，請不要跟老師說。」這裡提到的老師，無疑是指東熙市。後來，佐藤春夫陳諾保守秘密，他和「鄭」的關係也因為這個事件而拉近距離：

就這樣我和「鄭」變親近了，聽任「鄭」的推薦，渡過台灣海峽前往對岸地方也就是「鄭」的故鄉福建去了。那時的紀行，在南方紀行與台灣的各種作品或隨筆當中，幾乎已描寫殆盡。然而高雄與旗後的事，尤其是關於「鄭」的事卻還沒寫，想著想著也就把回憶如實地記錄下來了。

旗後的那個屋子，美其名說是藝旦間，其實是私娼寮吧。無論如何是個很新鮮的地方。「鄭」如今人在何處做什麼呢？⁷⁷

根據佐藤春夫所言，〈暑旅的回憶〉是追溯他四十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20年在高雄旗後的回憶，尤其和鄭氏有關的部分，在之前的紀行作品都沒有提及，所以這篇文章是記錄他在初抵台灣時與「鄭」相處的唯一一篇。但是，佐藤春夫的说法值得懷疑，因為在更早之前的台灣相關作品〈彼夏之記〉，已介紹過作者和「鄭」在高雄的交往。〈彼夏之記〉是1936年出版《霧社》的跋文，這本集子共收錄〈太陽旗之下〉、〈女誠扇綺譚〉、〈旅人〉、〈霧社〉、〈殖民地之旅〉、〈彼夏之記〉⁷⁸，全部屬於台灣相關作品，作品先後順序是依照旅程從南到北編排而成，而非成稿年代。集子最後以〈彼夏之記〉一文代跋，說明作者的旅台經過與行程安排，對佐藤春夫研究而言，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記載森丑之助所提供的旅行日程（預定）表。不過其中有一大段文字，是描寫作者在舊友東熙市家作客的情形：

白天，就是看羌、看猴子、午睡、和H家的剛學會爬的小孩玩。入暮，

⁷⁷ 〈暑かった旅の思ひ出〉，《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7卷），頁280-281。

⁷⁸ 藤春夫，《霧社》，東京：昭森社，1936年（昭和11）7月發行。本文引用之復刻本係由河原功監修，《霧社》，（日本殖民地文學精選集【台灣編】5），東京都：ゆまに書房，2000年9月發行。

則渡過港灣乘涼，到旗後的本島人部落參觀。地名就旗後，大概是因為在砲台的後面而得名的吧！登臨深埋於雜草中如同廢墟的廣大砲台，獨吟「夕陽西沉海面闊…」的詩句，遠眺著夕照霞空，迎著渡過海面吹來的涼風，見身影曳地時，才知道不不知不覺間背後已是月上柳梢頭了。這時會感到荒涼的四周令人毛骨悚然，於是快步走下小巷。H的醫院裡有一個叫做某某的本島人徒弟幫忙做技工的工作，他就住在這裡的巷子內。看到我來，就拉我到他家中，請我喝杏仁湯等等。他也有時也會以當我的嚮導為藉口，帶我到附近的酒家去。⁷⁹

乍看這些文字，尤其是畫線的部分（筆者所加），似乎不是在形容鄭氏。佐藤春夫沒有提到這個人的名字，而且說他的出身是「本島人」。但是仔細推敲，除了名字未明和出身問題，其他經歷都和〈暑旅的回憶〉所提到的鄭氏相當吻合。這是啟人疑竇的地方，佐藤春夫會搞錯鄭氏的出身嗎？或者是東熙市另有徒弟？答案顯然都不是，佐藤春夫有可能故意模糊這個部分。

1922年的《南方紀行》深刻描寫福建之旅的鄭氏形象，1959年的〈暑旅的回憶〉則回想作者和鄭氏在高雄的過往。兩篇文章都清楚點出鄭氏的廈門背景。然而在1936年的〈彼夏之記〉，卻刻意模糊鄭氏的出現與身分。此外，佐藤春夫在1937年的一篇雜感〈話說廈門〉提到他對1920年代的廈門印象，兼論當時廣東軍政領導人、奧系軍事將領陳炯明的事蹟，此文也隻字未提鄭氏這位嚮導者。這篇文章還指出，福建地方的排日氣氛非常強烈，並非適合安心旅行的所在，他無法確知自己當初前往中國的動機為何⁸⁰。總而言之，在佐藤春夫的台閩相關作品中，出現在中國的「鄭」有許多負面書寫，台灣場景下的「鄭」則投以溫情的眼光。而在1930年代，他顯然不願正面談論「鄭」，〈彼夏之記〉以「叫做某某的本島人徒弟」輕描淡寫帶過，在〈話說廈門〉甚至完全不提。是因為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他也意識到自身與中國的漸行漸遠，所以讓他對「鄭」這位人物有些敏感？

佐藤春夫的台灣相關作品〈殖民地之旅〉，因為涉及殖民地的文化與政治問題，也有幾位台灣人物是隱匿其名。日本學者河原功認為：「這部作品內藏著春夫對於被殖民者的台灣人，特別是台灣知識分子的同情。」⁸¹不過鄭氏的案例，

⁷⁹ 邱若山譯，〈彼夏之記〉，《殖民地之旅》，頁342。畫線部分為筆者所加。

⁸⁰ 佐藤春夫，〈廈門のはなし〉（話說廈門），《改造》，1937年12月。本文係參考《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1卷）所收之底本，頁407。

⁸¹ 關於〈殖民地之旅〉的書寫策略，請參閱河原功著，莫素微譯，〈佐藤春夫「殖民地之旅」的真相〉，《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2004年3月初版，頁3-22。

誠非如此。這是一種潛意識的洩露，而成為表意識的呈現。透過佐藤春夫在「鄭」這個角色的書寫轉折，可以側面理解他看待台灣與中國的態度。作為帝國之境的極南表徵，台灣成為日本人體驗南方風土的最佳場所。他的目光，投射出文明人的自然憧憬，也蘊含殖民者的帝國慾望。佐藤春夫把他的南方憧憬，移情到台灣。台灣的熱度，燃燒出他的詩情，譬如炎陽的艷麗花朵、滾熱的杏仁湯、砲台廢址的荒涼詩趣，都流淌著濃烈的南方情調。甚至滯留高雄時，有時會以嚮導為藉口，帶佐藤春夫到附近酒家的「鄭」，縱使兩人對於女性品味截然不同，佐藤春夫也會以朋友的義氣相挺，沒有將涉足風月場所的事告訴東熙市。因為台灣的殖民地身分與南方地理，更由於結識森丑之助，他對於台灣的人事物，產生許多共感（sympathy），進而萌生了同情與包容的態度。

換一個角度來看，佐藤春夫曾經自稱是日本「中國趣味愛好者的最後一位文人」。明治維新以降，日本國民逐漸崇尚西洋，中國事物已不能再引起興趣，佐藤春夫卻始終抱持「支那趣味」。而佐藤春夫的中國認識，得自先祖的意志，父親的教育，可說是父祖之輩的遺產⁸²。佐藤春夫的「支那趣味」，其實是指向傳統的古老中國，而非轉變的現代中國。中國的騷動不安，撼動佐藤春夫的心境，1922年的《南方紀行》已經可以看出轉向的徵兆。《南方紀行》的第一部分〈廈門的印象〉，幾乎都在敘說作者初抵廈門後的焦慮情緒。大時代的變化，以佐藤春夫的纖細感性，他不可能沒有察覺。中國人的反日姿態，他或許已有心理準備。不過，他的忐忑旅情，顯然來自鄭氏的疏忽，嚴重影響旅情。儘管在晚年時分，佐藤春夫以溫暖的眼光回憶鄭氏這位人物，但是就中國之行而言，作為一個引路者，「鄭」確實有失職的部分。曾經在旗後和「鄭」分享秘密的佐藤春夫，來到對岸的福建地方之後，因為中日之間的緊繃局勢，他對鄭氏的關係，出現共感的界限，兩人的友誼也面臨考驗。廈門所漂蕩的氣氛，「鄭」的不可信任，一再地加深旅行者的疑慮。佐藤春夫的戒慎緊張，也間接透露出他對1920年代中國的態度。

四、風景心境：台灣與中國的光與影

旅行者眼前的風景，往往能牽動心境的變化。相對的，心境也能影響風景的視野。風景與心境的交疊鏡像，從佐藤春夫的閩台相關作品可見一斑。儘管他

⁸² 佐藤春夫，〈からもの因縁——支那雜記の序として〉（唐物因縁——支那雜記之序），《支那雜記》，1941年（昭和16），東京：大道書房。本文係參考《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2卷）所收之底本，頁179-184。

的憂鬱情事常干擾旅心，不過異境的新鮮感也撞擊出許多詩趣。做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歷經 25 年的殖民統治，1920 年代正在快速地邁向文明化，日本文化與語言使用方面也漸趨成熟。佐藤春夫得到總督府方面的協助，沿途都有官方人士照料。語言與人情的交流，讓他如同置身內地，而獲得快適的一夏。誠然，台灣之旅既能體驗異國情調，又有日常的熟悉感，令佐藤春夫一生中回味無窮。反觀同期的福建之旅，當時正值粵桂兩軍開戰前夕，巴黎和會後的山東問題又使中國沿岸各地強烈散佈著反日氣氛。當時，中國正面迎接大時代的震盪，日本則展開擴張帝國的壯志，瞬息萬動的歷史時刻，改變了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佐藤春夫曾自稱恐怕是最後一個愛慕中國文化的文人，《南方紀行》也不免傳達出危疑不安的心情。當個人的「支那趣味」與國家問題產生衝突，矛盾則不時浮上他的胸臆，成為情感天平上互相浮沉的對手。

因此，1920 年佐藤春夫在台灣與中國，不只是風景上的差異，更有心境內的映照。透過佐藤春夫當年的兩位引路人：森丑之助與鄭氏，頗能側面理解他對台灣與中國的思考。森丑之助的人格特質，顯然吸引佐藤春夫的好感，可以成為心靈契合的對話者，直到森丑之助去世前，兩人始終保持密切聯繫。而中國方面的嚮導者「鄭」，則是一個完全不會日文的人物，兩人僅能以簡單的英語交談。但是他們之間的溝通障礙除了語言問題，也涉及到「鄭」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條件。從佐藤春夫的文字去推敲，他點出「鄭」的文明程度與審美品味是屬於低級情趣。尤其在福建旅行之初，鄭氏更是一位失職的導覽者，在抵達廈門之後，就一再出現「缺席」的狀況，令佐藤春夫精神緊張。他的人品與責任感，都受到佐藤春夫質疑。嘗試比較台灣旅行與福建旅行的優劣，可以說台灣在政治和人情都佔有絕對優勢。

天時、地利、人和，決定了佐藤春夫在 1920 年的旅行條件。其中，引路人的行動指引，影響旅行者的觀看角度最廣。以人類學者的導覽觀點，向佐藤春夫詳細介紹台灣景點的森丑之助，重點推薦台灣的原始部落（請參考上節附錄的「森丑之助所提供的旅行日程（預定）表」），可以發現他當時引介的景點，在 1920 年代後期以降，多數成為台灣在制度化旅遊的景點。換一個角度來說，這也象徵著殖民地的現代旅行制度趨向成熟化。不過像佐藤春夫的原住民深度之旅，恐怕只有日本人才有機會體驗。在殖民者的「理蕃」政策之下，原住民的生存空間被規範在固定的區域之內。日治時期以原住民為主題的作品，多出自日人作家之手，都是旅行「蕃地」的文學產物。佐藤春夫的殖民地之旅，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當代的南方熱潮。不過與森丑之助深交，使他對台灣有更為深刻的認識。佐藤春夫接受森丑之助的影響，對台灣產生一定程度的熱情。在〈霧社〉、〈旅人〉、〈日月潭遊記〉等作品，除了殖民地風土的描寫，也刻畫殖民者所留下的統治軌

跡，展現人道主義的關懷。台灣山林被馴服改造的，不僅是「蕃人」，還有許多野生風景。尤其是日月潭水壩的興建工事，吸引他的目光。他在許多文字中，反覆提到日月潭是否應該現代化的問題。

大正年間，日本人亟欲在既有的殖民基礎上發展輕工業，並充分利用水力資源，以提供工業發展所需的電力。1919年（大正8）4月，台灣總督命令籌設「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同年8月選定日月潭，著手興建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透過中央山脈中的濁水溪水源，以天然湖泊的日月潭為儲水湖，用標高2400尺的日月潭儲水，配水到門牌潭，利用落差1057尺知水力來推動發電機，而產生十萬瓦的電量。為了工程的進行，殖民者從縱貫線二水站分出一條鐵道直達電廠所在地，以運送工程所需的物資，這便是日後的縱貫鐵道集集支線⁸³。〈日月潭遊記〉和〈旅人〉重覆提到他去參觀日月潭的經過。佐藤春夫就是透過這條支線從二水坐小火車到集集，然後從集集乘轎往日月潭。

他在〈日月潭遊記〉提過自己是被《台灣名勝舊蹟誌》描述的景色所吸引：「令人驚訝的是在海拔二千五百尺的山上有周圍約四里多的大湖。水深平均一丈五尺，常呈紺碧之色。疑其池底有蛟龍暗潛」⁸⁴不過，當一行人逐漸接近日月潭，他發現路邊到處有積滿泥水的水窪，散發著腐臭草味的氣息，衍生一種荒涼頹頹之感。終於看到實景時，眼前只是個出奇大的沼澤，並不是周圍四里餘的大湖，和他的想像大異其趣。原本以為是一片亮綠的湖水，卻呈現混濁的赭褐色。不過，這種沉重的風景卻惹起佐藤春夫的共鳴：

水，看起來就是重重地沉澱著。連明朗的天空倒映出來的顏色，也是憂鬱而沉悶的色彩。那種無所謂似地無精打采的色調，比起明澈的水面，更是引人哀愁。我覺得這很好。卓越的文人畫風的繪卷，總是帶著氣韻，老氣橫秋。孤獨，是一種能讓人心情得到依託的孤獨。⁸⁵

日月潭帶著老病孤愁的樣貌，縱使令人情何以堪，卻引發佐藤春夫的惆悵。這片潭水靜靜地倚靠山林，旅人得到共鳴的，是油然而生的孤獨感。孤獨，該是如何排遣的心情？佐藤春夫在不同的文章，都以日月潭為主題，抒發了相同的愁緒。眼前的景色儘管廣闊，卻帶著無可言喻的寂落感。但是這種感觸，卻和本人俳句中的那種寂落感有所不同，是一種荒廢的美感：

⁸³ 鄧相揚，《日月潭史話》，台北市：觀光局，2000年，頁111-119。

⁸⁴ 邱若山譯，〈日月潭遊記〉，《殖民地之旅》，頁63。

⁸⁵ 邱若山譯，〈旅人〉，《殖民地之旅》，頁118-119。

我不學無術，不知道有什麼好例子可來說明，杜甫的詩裡大概會有表現這種寂寥的詩情之作吧。沉著又散發無可奈何的憂鬱美感。高貴的人對不幸的遭遇處之淡然的那種落寞感。父祖傳來的寬廣的我家屋簷傾毀掉的那種稍微污穢又令人懷念的感覺。這個由深山以及淺泛而廣茫的水域所組成的大自然，在這大自然中的人們的營為，從這其中我興起了前述的幻影。這次第，我一點也不生厭。而這自然的景觀，不久將會因電力公司的工程進度，在數年之內面目一新——到那時，不管有什麼新的別的美觀產生，但那也不會是今天我所看到的大自然了。思及此，我不禁興起無限感傷。⁸⁶

日月潭的自然景色，一方面帶有未開的野性美感，一方面也渲染傾頹待興的歷史色澤。如同父祖時代遺留下來的家屋般，勾引起親切而單純的感動。然而，這個帶有時間荒廢感的原始水域，將要興建成壯闊的蓄水池，雖然是象徵進步的現代工程，卻讓佐藤春夫興起了傷感。他不禁思索，所謂的人類文明，是對自然進行破壞或建設：

我聽了工學士的說明，深覺此工程事業實在浩大壯觀，又想，這一來，這裡又將變得如何呢？因而興起了對人類之作為的輕蔑感。哪邊的比重較大呢？我實在有點無法確定。只是，先前，近處傳來的潺湲水聲，聲聲入耳，令我傾聽神往，默然相許。⁸⁷（〈旅人〉，頁123）

如果以台灣人的立場來看日月潭水壩的問題，顯然是批判殖民化與現代化的雙重結構。然而佐藤春夫所注意的，是自然（nature）與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衝突。日本的南方熱潮，有許多複雜的政治背景，不過佐藤春夫在1920年代的南方憧憬，朝向自然膜拜的成分居多，是文明人對於現代性的一種抗拒姿態。因此他看日月潭的改造工程，興起了對人類之作為的輕蔑感，而傷感自然的永遠消逝。不過他也無法斷言孰重孰輕。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台灣的現代化似乎過於快速，破壞許多野性美。就如同日月潭被消費觀光的「化蕃」，他們熟練地歌唱舞蹈，只是一種「演戲」。「化蕃」之「化」，是被殖民化、被現代化，就如同台灣的原野山林，也即將面臨改造的命運。佐藤春夫並沒有提到開發行動與拓殖政策的關聯，關於自然與現代化的觀察，他是以一個文明人的反思，而非日本人的立場。雖然站在維護自然的一方，但是他個人卻無法逆轉現代化的趨勢，只能

⁸⁶ 邱若山譯，〈日月潭遊記〉，《殖民地之旅》，頁64。

⁸⁷ 邱若山譯，〈旅人〉，《殖民地之旅》，頁123。

任由風景的改變。

反觀中國，它的現代化腳步則太過緩慢，透過佐藤春夫的廈門印象，可以看出他的批判思維。佐藤春夫在抵達福建之後，旅遊廈門、鼓浪嶼，到集美地方參觀華僑所興建的集美學校，以及考察陳炯明所治理的漳州⁸⁸。在他眼中，廈門是一個風俗敗壞的地方，到處可見娼妓院與鴉片窟。當時流傳著一句話：「廈門是地獄，鼓浪嶼是天堂」，佐藤春夫似乎相當贊同這句話。在他的文字中，廈門可能是巨大中國的縮影，充斥著沉淪、墮落的中國人，反觀鼓浪嶼則流淌著清新進步的氣息。鼓浪嶼是位於廈門島外的一個小島，與廈門市區僅以 500 米的鷺江相隔⁸⁹。當時福建一帶有許多到南洋經商成功的華僑，回到故鄉後選擇在鼓浪嶼興建完全洋風或半中半西的別墅，到處矗立的豪華建築使當地如同一座大型的公園。鼓浪嶼原本是未經開發的地區，因為這些華僑的經濟回饋，洋溢著現代化的進步朝氣。

在到達鼓浪嶼的第八天，他們前往集美地方⁹⁰。《南方紀行》的第三部分「集美學校」，就是描述佐藤春夫在鄭氏的帶領參觀集集中學的經過⁹¹。這所學校是

⁸⁸ 雖然他沒有言明自己的出發與滯留時間，但是根據《南方紀行》的一段文字：「在廈門的第 12 天，是農曆 6 月 17 日」（佐藤春夫，《南方紀行》，頁 122），可以大致推算出他的行程。在島田謹二的〈佐藤春夫氏の『女誠扇綺譚』〉，推算出佐藤春夫所說的「舊曆 6 月 17 日」，就是新曆的「8 月 1 日」，收入《華麗島文學志》，東京都：明治書院，1995 年，頁 354。黃美慧的論文中，已推測出佐藤春夫的大致行程：7 月 19 日或 20 日，從高雄出發，在船上過一夜。7 月 21 日-22 日，住廈門。7 月 23 日-31 日，住鼓浪嶼（7 月 29 日，看章美雪女士之墓；7 月 30 日，到集集中學及廈門街）。8 月 1 日，到漳州，住中華旅社。8 月 2 日，參觀漳州，住許氏醫院。8 月 3 日，住鼓浪嶼或廈門。8 月 4 日或 5 日，搭船往基隆。請參閱黃美慧，〈佐藤春夫與台灣中國：大正九年的台福之旅〉對比兩地之旅，《東海學報》，第 33 卷，1992 年 6 月，頁 177。關於住宿的部分，筆者在此補充兩點：一、佐藤春夫曾經說過：「在廈門港內的鼓浪嶼，住在高砂銀行廈門分行長林水木氏的宅邸，受到各種的招待。」，請參閱〈詩文半世紀〉，《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 18 卷）所收之底本，頁 109。二、佐藤春夫在《南方紀行》有記載，抵達漳州後投宿於當地名醫許連城所開設的宏仁醫院二樓。而他後來所創作的〈星〉，就是投宿在宏仁醫院二樓時，從漳州的嚮導徐朝帆所聽來的故事，請參閱《南方紀行》，頁 176-177。

⁸⁹ 鷺江位於廈門島和鼓浪嶼之間，又叫做廈鼓海峽，僅約 500 公尺。因為廈門島又稱鷺島，所以廈鼓海峽也稱為鷺江。

⁹⁰ 集美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廈門島西北面，原先屬於同安縣的一個小村莊，地處東溪至石潭入海處，其海灣稱潯江，潯江西岸延續到這個村莊已是末尾，村莊因此得名潯尾，後改名為集美。

⁹¹ 《南方紀行》的第一部分「廈門的印象」，描述佐藤春夫初抵廈門的經過。其餘各章節，根據黃美慧的論文，已研究過《南方紀行》的重點內容：佐藤春夫到達鼓浪嶼的第 7 天，由鄭氏陪同下中國交涉署辦事，後來至附近散步，造訪一位少女的墓地，構成《南方紀行》的第二部分「章美雪女士之墓」。隔天他們搭小船前往集美地方參觀集集中學，見到該校的校醫兼中國文學講師陳鏡衡先生，這是第三部分〈集美學校〉。在當天離開集美之後，下午順著鷺江回鼓浪嶼，欣賞了鷺江的夕陽。隨後在鼓浪嶼結識漳州軍參謀長林季商的長子林正熊，該晚一行人雇小船到廈門逛了妓院與茶藝館，這是第四部分〈鷺江的月光〉。從廈門回來之後，鄭氏有事先回高雄，後來由廈門的日本小學老師徐朝帆與余錫華，以及在漳州執醫的許連城三人做嚮導，他們共同遊歷漳州的諸般經過則構成本書第五部分〈漳州〉。請參閱黃美慧，〈佐藤春夫與台灣中國：大正九年的台福之旅〉，《東海學報》，第 33 卷，1992 年 6 月，頁 176-177。至於最後一個部分〈朱雨亭的事與其他〉，黃美慧的論文並沒詳細說明。根據佐藤春夫的文字，朱雨亭是漳州中學的老師，

由華僑陳嘉庚（1874-1961）為回饋鄉里所創建，從此促成集美地方的學術風氣。陳嘉庚出生於福建省同安縣集美村，父親在新加坡經商。在 17 歲時第一次奉父函召，出洋新加坡習商，之後就經常往來福建與新加坡之間。1912 年返鄉籌辦集美學校，1913 年集美學校正式開學。1919 年，回國籌辦廈門大學，組織同安縣教育會，對各鄉小學給予常年補助，受益者三十多校。1920 年集美學校增設女子師範和商科，並創辦集美水產航海學校⁹²。根據佐藤春夫的文字，在前往集美的船程，鄭氏告訴他關於集美學校的歷史：因為廈門是風俗不好的市鎮，教育少年只能選擇像集美這樣的鄉間興辦學校。除了校舍建築費用的投入，校方更免費讓學生寄宿。每個星期六的午後，學校會用兩艘大型船隻運送學生與老師前往廈門。因為集美地方的土地、生活消費都很低，以陳家的資金是遊刃有餘，可以建設相當完善的學術環境。不過，中國人對於公共事業向來並不熱心，集美學校的成立，不僅對地方上來說是件罕事，在中國全土也是很稀奇的⁹³。對公共事業不感興趣的佐藤春夫，關於集美學校的存在也頗有好奇心，而把它當作值得一看的景點。

在抵達集美學校之後，他們除了參觀校區，也接受校方的好意在該校食堂用膳，進而結識了該校校醫兼中國文學講師的陳鏡衡先生。陳鏡衡對於佐藤春夫的漢學素養甚感好奇，通過鄭氏的翻譯，向他詢問了關於做詩之類的問題。後來兩人當下約定互相贈詩，只見陳鏡衡備好筆墨，立即寫出一首詩：

贈佐藤春夫先生

陳鏡衡急就草

如雷灌耳有隆名，

遊歷萍逢倒屣迎

小說警時君著譽

黑甜吾鄉愧難醒⁹⁴

陳鏡衡慎重地將此詩交給佐藤春夫，然後等待對方的回覆。這種突發狀況令佐藤春夫相當困惑，他在《南方紀行》中宣稱，自己久未做詩，所以不知所措，

是令他頗為懷念的一位人物，作者在最後一節回憶兩人的相識過程，以及同遊漳州的一些經歷。
⁹² 係參閱集美大學網頁 <http://www.jmu.edu.cn> 之學校概況介紹。集美大學前身院校淵源於陳嘉庚先生創辦的集美學村各校。1994 年，由集美師範專科學校、集美航海學院、廈門水產學院、福建育學院、集美財經高等專科學校五所院校合併組建而成。在長期辦學的實踐中，形成航海、水產專業的優勢與特色。

⁹³ 佐藤春夫，《南方紀行》，頁 61。

⁹⁴ 佐藤春夫，《南方紀行》，頁 70。

雖然當時也寫了一首詩回贈陳鏡衡，不過卻已忘記內容，因為是很拙劣的作品。其實，佐藤春夫並非不擅作詩之人，只是兩人尚屬萍水相逢，顯然當下無法引起他的詩興。對他來說，這一首贈詩只是形式上的客套辭令，陳鏡衡從未讀過自己的作品，那些讚美之詞純粹是對外來客的恭維話。不過詩的最後一句卻明白指出中國的困境，引起佐藤春夫同感。所謂的「黑甜吾鄉愧難醒」，映襯出中國知識分子的覺醒。佐藤春夫回想來到廈門之後，在市街上極目所及的荒唐景象，對照詩中的自省，他讀出陳鏡衡的焦慮心情。雖然只是一首應酬之詩，卻有它的微言大義在其中：

前揭的陳鏡衡之詩，根本只是形式上的一些恭維話。但是，來到廈門之後我隨時的所見所聞——以目前兵火不絕的國情來說吧，在夜晚從市街的後巷經過，所到之處成排聚集著招呼過路人的賣春婦，在私娼寮的當中還雜處著鴉片窟，真是不正經。一瞧之下，更有意想之外的可疑畫面：任由少年子弟行走在此路；還有苦力蹲在路邊的狹小空地上，用小石子和地面為道具用「行直」的方法進行賭博遊戲；又在時髦洋館的輝煌電燈下，從馬路上可以看到二樓陽台上出現一位戴著金框眼鏡、似乎有教養的年輕婦女恬然沉溺於賭博。以同樣的眼光讀了「黑甜吾鄉愧難醒」，加上這是出自於一位將新文化播種在這片貧瘠土地的集美學校老師心中，這一句話絕對不是空洞的。一介遊子如我也憐憫起他對於國家的憂心。⁹⁵

清朝末期的封建中國，內憂外患此起彼落。1919年五四運動的意義，標誌著新時代的到來，也意謂新知識分子的崛起。然而這一場革命，還有長遠的路途要走。以廈門的情況為例，縱使到處軍火戰亂，但是市井小民卻沉迷於性與鴉片的黑甜魅惑。更令佐藤春夫困惑的是，曖昧的里巷紅燈區內，竟然可見少年人的身影。路旁更有勞工聚眾賭博，連看似具有教養的女性也耽溺於此。因此他看到陳鏡衡的詩，油然生起同情之心。舊中國的病徵，除了故步自封的封建體制，還有墮落的國民性。中國要步入現代化國家，不僅要揚棄沉重的傳統包袱，還需要國民的自我覺醒。佐藤春夫對陳鏡衡而言，恐怕只是今生僅有今日相會的緣分。在一位陌生的訪客面前，坦白自己國家的痛處，其實是一件難堪的事，這也就是佐藤春夫感到憐憫之處吧。

佐藤春夫成長的年代，日本已經超越中國許多。不過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

⁹⁵ 佐藤春夫，《南方紀行》，頁72-73。

德川派與倒幕派也經過強烈抗衡，當時面臨國內秩序瓦解、歐美列強環伺的困境，在強烈的危機意識之下，日本人的民族意識覺醒，終於完成維新運動而逐步成為亞洲強國。福澤諭吉在明治時期所提出的〈脫亞論〉，更明確指出日本應該學習西洋，對於東亞其他國家則採取蔑視的態度。他指出，日本雖然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精神已經推離東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方文明轉移。但是近鄰的中國與朝鮮，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文明改進之道。東方文明是墮落的，因此日本必須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野蠻之地⁹⁶。以福澤諭吉在明治時期的重要性，佐藤春夫必然讀過〈脫亞論〉，也熟知福澤諭吉對中國與朝鮮的批判。佐藤春夫在廈門街上所看到的亂象，似乎印證了福澤諭吉的話。不過在參觀集美學校之後，他看到整齊美觀的校舍、衛生乾淨的食堂，年輕學子也能夠流利使用英語。清新、蓬勃的學習風氣，不僅使他認同創校人陳嘉庚為現代化教育的用心，也讓他感受到中國的現代化正在這裡萌芽。

集美學村帶給佐藤春夫的震撼，是舊中國的新文明體驗，也是一種現代性的美感視野。關於自然風景的感觸，則以〈鷺江的月光〉描寫最為鮮明。在傍晚離開集美地方之後，佐藤春夫搭乘舢舨順著鷺江回鼓浪嶼，欣賞到鷺江的夕陽。那一幕景色，使他相當感動，在一生當中，從未遇到與自己趣味如此契合的自然⁹⁷。因此引發他的興致，建議去聽歌。隨後在鼓浪嶼結識漳州軍參謀長林季商的長子林正熊，該晚一行人雇小船到廈門逛了妓樓與茶藝館，直到凌晨三點才踏上歸途，從而看到鷺江的月光。這也是構成《南方紀行》的第四部分〈鷺江的月光〉。從夕陽到月光，佐藤春夫在一天之內，看盡了鷺江的美景。鷺江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地方，佐藤春夫的旅情顯然有被吸引，連划槳的老舟夫也牽動他的悲傷。水色的魅力，令他難以抵擋。在台灣的日月潭，他也是透過山光水景，被召喚出千絲萬縷的愁緒。

佐藤春夫的詩人神經是相當敏感纖細，那件困擾他內心的情感問題，似乎在《南方紀行》沒有刻意被提起。反觀他在台灣相關作品中，屢屢提及心愛女子的影像，這亦是兩地旅行的差異點之一。在福建因為沒有遇到日本女性，或許也由於他刻意壓抑情感，所以並未觸及私人感情的描寫。除了沒有相似之人以勾起傷痛，他顯然將全副心力放在適應異域旅行的緊張，也就無暇想起。而台灣旅行的生活太過安心，他內心深處的煩惱遂又悄悄地佔據他的內心。對照 1920 年佐藤春夫筆下的台灣與中國，台灣像是一幅輕快的水彩畫作，高雄的溽暑、霧社的山野、日月潭的水色，飽滿色彩而呈現繁複的重疊意象；中國則帶出頗為凝重的筆觸，首夜在廈門的紊亂心情，色澤晦暗不明，其後鼓浪嶼的華美、鷺江的月明，

⁹⁶ 〈脫亞論〉是福澤諭吉在 1885 年（明治 28）3 月 16 日發表在《時事新報》的著名短文。

⁹⁷ 佐藤春夫，《南方紀行》，頁 91。

則為中國扳回幾成顏色。

台灣與中國的風景，誠然反映出旅者的心境寫照。台灣的殖民地環境，有旅行上的優勢；政情與人情的調和，造就出台灣之旅的愉快印象。另一方面，巴黎和會後中國與日本的敵對關係開始鮮明化，佐藤春夫在中國的緊張心情，主要原因顯然不是來自中國本身的動亂，而是中國人對日本人的仇視態度。換個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野心，在某種程度上也激起許多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佐藤春夫的父祖之輩，即是具備豐富漢學素養之人，在他的內心，對中國自有一份深刻的孺慕情感。不過他所熟悉的中國，是沉穩安定的古老中國。他一方面景仰中國傳統的文教禮樂，一方面也會以現代知識分子的眼光來審視前近代中國轉向近代中國的變與不變。因為 1920 年的旅行，實現佐藤春夫的東亞初體驗。透過這一年的南方行旅，他完成了壯年時期重要的幾篇南方書寫，也開啟他往後朝向南方的旅途。

五、結語

1920 年返日之後，佐藤不斷在文章中給予此趟行旅以正面的評價：「回想那次旅行，放浪自適，真是我青年時代的難忘的一季。」（〈彼夏之記〉，頁 346）他也曾在討論旅行經驗〈失敗之旅、成功之旅〉一文，提到台灣旅行的成功：

對照最初九州旅行的失敗，十年後的台灣之旅是成功的。在台灣這個地方，受到移住於此的中學時代的同窗好友以家人般的待遇招待了一夏。不僅當時的台北博物館長森丑之助先生替我訂定旅行計畫，其他必要的事項也依賴官方，讓我在旅行過程中得到方便而進行的很順利。因此，我得以探入蕃山的內部，也能在百日間幾乎遊遍全島，幾乎是一趟毫無遺憾的旅程。在這個島上大體參觀之餘，也遊歷了對岸的廈門而增添許多詩興。丙牛先生（按：森丑之助）說，為了要真正了解台灣，就不能不知道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滿丹等南方諸島。我想是因為他的意見吧，所以我後來才會有去南方從軍的機緣。⁹⁸

當時，森丑之助所重點推薦的，就是台灣山地與原住民部落的參觀。在天時、

⁹⁸ 佐藤春夫，〈失敗の旅、成功した旅〉，《日本の風景》，東京：新潮社，1959 年 7 月發行，頁 70。中文部份為筆者自譯。

地利、人和的最佳裝置下，佐藤春夫完成了台灣之旅。而森丑之助對他的言行啟示，也深遠到促使佐藤在戰爭期間遠赴南方從軍。1938年（昭和13），他成為中日戰爭的隨行記者，到中國武漢參加作戰，也開始發表一系列的戰爭詩⁹⁹。1943年（昭和18），他則以從軍作家的身分到南洋的馬來、爪哇等地¹⁰⁰。森丑之助對他的建議，是以人類學者的觀點來談的：「為了要真正了解台灣，就不能不知道爪哇、蘇門答臘、加里滿丹等南方諸島。」森丑之助的這番話，是建立在台灣山地原住民人種原屬於南島語系¹⁰¹，所以要了解台灣（原住民）的話，就必須知道他們的發源地——南洋群島。不管佐藤的南島之行與森丑之助有多密切的關係，可以確定的是，森丑之助的原住民觀對他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在森丑之助的引領下，佐藤春夫才有近距離接觸台灣原住民的機會，也成為他在台灣相關作品中的重要部分。

可以說，佐藤春夫在同期的福建之旅，也是南方初體驗的一部分。他曾經在1937年的〈話說廈門〉自問，當時中國福建地方的排日氣氛非常強烈，並非適合安心旅行的所在。回想起來，他無法確知自己當初前往中國的動機為何¹⁰²。追溯起來，佐藤春夫的殖民地之旅也是臨時起興。在故鄉遇到舊友東熙市、在台灣結識森丑之助，似乎是促成他到台灣以及隨後福建之行的關鍵，當然東熙市的門徒鄭氏，也是這趟旅行的助力之一。不過，與其說是他人的提議，毋寧說是佐藤春夫自身的浪漫情懷與南方憧憬，驅使他前往南方夢土，進而激發他在創作上對南方的幻想力。這也和日本在昭和中期以降的南方熱潮有直接關聯。佐藤春夫直言，他是一個喜歡暑夏的人。他在體質上或情感上，都和夏天相當契合，夏天也可以視為南方的轉喻。他的故鄉是日本南方的紀州，在青年時期就前往東京發展，當情感或生活出現波折，他總會回到故鄉以尋求慰藉，甚至驅使自己前往更未知的「南方」。南方的自然風土，是一個可以治癒被現代病「憂鬱」所苦的安穩場所，另一方面，則大幅超越近代的道德而成為容許

⁹⁹ 請參閱佐藤春夫，《戰線詩集》，東京：新潮社，1939年（昭和14）；《大東亞戰爭》，竜吟社，1943年（昭和18）；《奉公詩集》，千歲書房，1944年（昭和19）。本文參考之版本為《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一卷），京都市：臨川書店，1999年，頁161-188、頁227-254、頁263-290。

¹⁰⁰ 根據奧出健的〈佐藤春夫—南方の旅〉，推定出佐藤春夫在1943年（明治18）-1944年（明治19）的南方旅程沿經以下地方：1943年10月底往南方出發，11月初旬抵達馬尼拉，隨後停留新加坡、馬六甲並經過吉隆坡，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在雅加達，12月中旬到爪哇中北部的格拉幹，12月下旬到泗水。1944年1月到峇里島旅行，隨後幾個月往來泗水、瑪琅、雅加達，5月27日從南方返日。此篇文章收入木村一信、神谷忠孝編，《南方徵用作家：戰爭と文學》，京都：世界思想社，1996年，頁203。

¹⁰¹ 鈴木質，《台灣蕃人風俗誌》，台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年（昭和7）發行，頁12-19。

¹⁰² 佐藤春夫，〈廈門のはなし〉（話說廈門），《改造》，1937年12月。本文係參考《定本佐藤春夫全集》（第21卷）所收之底本，頁407。

兇猛想像力馳騁的危險場所¹⁰³。佐藤春夫一邊呼吸南方的自然氣息，一邊也被「恐怖」的非文明力量所蠱惑。

川本三郎在《大正幻影》說過：「可以知道大正時代文學者的『南方憧憬』成為日本經濟發展『南進論』的配套措施。當然佐藤春夫不可能沒有意識到這種『南方進展』。在〈日月潭遊記〉當中，書寫了日月潭附近的霧社因為『生蕃蜂起』，所以日本人好像全部被消滅的傳聞（並非昭和5年的霧社事件）。又或是在《南方紀行》記載了在中國走在對日本人有強烈反感的廈門市街上，到處牆壁上可見『青島問題普天共憤』、『勿忘國恥』的標語，以及『勿用仇貨』、『禁用劣貨』等排斥日貨的塗鴉口號。在中國本土的漳州，中國友人要他注意『在這裡不要太說日語比較好，因為大家都討厭日本人』。」¹⁰⁴川本三郎認為，佐藤春夫在台灣或是中國都遇到威脅日本人的事件，還能夠保持旅行的絕佳心情，絕對不是對現實無知，而是一位浪漫主義者的南方憧憬……。他在1920年的台灣與中國南部之旅，顯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完成的。

然而，相較於殖民地之旅的好心情，佐藤春夫的中國首航顯然較有缺憾。1927年（昭和2）佐藤春夫二度前往中國，這次他受到郁達夫與田漢的熱情招待，自然也沒有語言溝通的問題¹⁰⁵。佐藤春夫除了對中國經典文學表示出濃厚的興趣之外，和許多新文學家關係頗為密切，跟郁達夫、田漢、郭沫若、徐志摩、周作人、魯迅等人都有過不同程度的過往。佐藤與魯迅的長期交流，使1935年岩波文庫日譯《魯迅選集》的刊行得以實現，在將魯迅介紹給廣大日本讀者這一點上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中國作家方面受到佐藤春夫極大影響的，首推浪漫派作家郁達夫。郁達夫的成名作《沉淪》無疑深受佐藤春夫《田園的憂鬱》的啟發，他也被人稱為「中國的佐藤春夫」。不過，佐藤春夫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不久所完成的〈亞細亞之子〉¹⁰⁶，以「鄭」和「汪」兩位主角，影射了郁達夫和郭沫若，造成郁達夫與他反目成仇。後來郁達夫寫了一篇文章〈日本的娼婦與文士〉¹⁰⁷，以文章正式向佐藤春夫告別。作者的書寫策略誠然帶有極高的政治意識形態。佐藤春夫與郁達夫的決裂，其實和國家立場的對立有密切關係。在《南方紀行》已經出現一些徵兆，也可藉此窺探他在1920年代和中國作家的交集，乃至中日

¹⁰³ 川本三郎，《大正幻影》，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頁212-213。

¹⁰⁴ 川本三郎，《大正幻影》，東京：筑摩書房，1997年，頁203-221。在本書中出現許多錯別字，例如引文所舉的「勿用仇貨」，誤植為「勿田仇貨」；「漳州」，誤植為「潭洲」。

¹⁰⁵ 郁達夫在1913年赴日本留學，1919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1922年畢業回國。郁達夫在日本留學，日語自然流利。此外，他不僅精通日語，還會多國語言，是一位語言天才。田漢1917年隨舅父去日本，最初學海軍，後來改學教育，進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就讀，熱心於戲劇，也精通日語。

¹⁰⁶ 佐藤春夫，〈亞細亞之子〉，《日本評論》，1938年（昭和13）3月號。

¹⁰⁷ 郁達夫，〈日本的娼婦與文士〉，《抗戰文藝》，第1卷第4期，1938年5月9日。

戰爭爆發後和郁達夫等人的決裂。

在佐藤春夫發表〈亞細亞之子〉的當時，應該有許多曾經和他友好的中國作家都會感到錯愕與不解。對中國事物向來投以親近姿態的佐藤春夫，為何在一夕之間有了極大轉變？這恐怕是許多人無法理解的問題。但是，如果重新閱讀他在《南方紀行》的中國印象，或許可以從中找到答案。《南方紀行》在發表後，受到作家井上靖和評論家島田謹二的注目。佐藤春夫在風景上的書寫技藝，把水光的魅力表露無遺¹⁰⁸。可以發現，《南方紀行》關於人物的描繪，除了〈集美學校〉之外，多聚焦在民族性的落後面，顯然是作者對現實中國最直接的反應或反感。但是他屢次把目光放在山光水色，以純淨的心情欣賞純粹的風景，在此時此刻，他的文字呈現一種柔和的美感。誠然，佐藤春夫的書寫方式，是選擇性地展示台灣與中國，這是一種抽樣性的文化觀察，而其中所凸顯的文化位階是頗為鮮明的。其中，他的中國想像，更是停留在古老中國的憧憬之上。當他目睹轉型期的中國是如此狼狽不堪時，他的《南方紀行》也出現了繁複的文化隱喻。南方顯示了與近代文明背道而馳的地理位置，台灣與中國福建的位置，都在日本的南方。台灣的自然風土，顯然比中國福建更接近佐藤春夫理想中的南方典型。因此他對中國的眼光是比較嚴肅的，而對於台灣，則多了一份認同的情感。

佐藤春夫總共去過中國四次，中日戰爭期間是以隨軍作家的身分前往。在1943年的太平洋戰爭期間，他還隨日軍遠赴馬來半島、爪哇等地。這些南方的長征經驗，佐藤春夫都記錄在戰地所創作的詩集。顯然，他的東亞體驗是以1920年的台灣和中國作為起點，然後逐漸向南方前進。憑藉佐藤春夫的知名度，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他對中國和台灣的文學發展應該起了一定的啟發作用。不過進入戰爭期間，中國方面的聯繫被他自己切斷，他的書寫姿態也轉而積極參與日本帝國的擴張。而在台灣的日人文學方面，作家中村地平、西川滿在1930年代後期至1940年代的台灣書寫，顯然深受佐藤春夫在台灣書寫之影響，可以納入佐藤春夫的文學系譜，如果深入探討《文藝台灣》的作家作品，這條影響系譜極有擴大的可能¹⁰⁹。

¹⁰⁸ 姚巧梅，〈佐藤春夫文学における中国・福建の位置——『南方紀行』を中心に〉（在佐藤春夫文学裡中国・福建的地位——以『南方紀行』為中心），《皇學館論叢》，第38卷第2号，2005年4月，頁55。

¹⁰⁹ 本論文的第四章與第五章，將會探討深受佐藤春夫台灣相關作品影響的日人作家中村地平、西川滿。另外，《文藝台灣》的編輯策略，則安排在第五章第一節中討論。

附錄一

佐藤春夫 (Sato Haruo) 年譜

1892 年 4 月 9 日-1964 年 5 月 6 日

1892 年 (明治 25)

4 月 9 日誕生於和歌山縣新宮市，父親佐藤豐太郎，母親政代，為家中長男，上有一位姐姐保子。當時父親經營佐藤醫院，春夫即在該醫院出生。

1895 年 (明治 28)

7 月，弟弟夏樹出生。

1898 年 (明治 31)

4 月，進入新宮尋常小學校就讀。6 月，弟弟秋雄出生。

1902 年 (明治 35)

4 月，進入新宮高等小學校男子部就讀。

1904 年 (明治 37)

4 月，進入和歌山縣立新宮中學校就讀。

1907 年 (明治 39)

第三學年被留級。

1908 年 (明治 41)

3 月，初次使用眼鏡。7 月，短歌投稿《明星》獲刊，選者為石川啄木。

1909 年 (明治 32)

1 月，《スバル》(創刊號)發表十首短歌。2 月、3 月的《スバル》各發表五首。8 月，參加市內所舉辦的文藝演講會，在會中的發言引起地方教育會的批評，被學校無限期停學。在這次演講會當中，結識了與謝野寬、生田長江、石井柏亭。11 月，停學處分被解除。上京投靠生田長江。

1910年（明治43）

3月，中學畢業。4月，上京，師事生田長江，加入與謝野寬的新詩社。結識堀口大學。9月，進入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預科就讀。在學中於《スバル》、《三田文學》、《我等》等刊物發表詩文。

1913年（大正2）

8月，探討森鷗外作品《意地》的評論〈*Sacrilege*〉發表在《スバル》。該年成為《スバル》的主要執筆者之一。

1914年（大正3）

慶應義塾大學退學。成為《我等》的同志，結識森鷗外。

1915年（大正4）

對繪畫展現興趣，兩幅作品入選第二回二科展覽會（往後連續兩年在第三回、第四回亦入選）。

1916年（大正5）

4月，移居至神奈川縣都筑郡（現在的橫濱市港北區）。9月，〈生病的薔薇〉已有腹案。12月，再回到東京定居。

1917年（大正6）

1月，《星座》創刊，〈西班牙犬之家〉於該誌創刊號。6月，〈生病的薔薇〉發表於《黑潮》。結識谷崎潤一郎。9月，與無名氣的女星小笹文子（米谷香代子）同居。12月，重新起筆〈田園的憂鬱〉。

1918年（大正7）

創作活動逐漸引起文壇矚目。7月，經由谷崎潤一郎推薦，〈李太白〉發表於《中央公論》。8月，〈指紋〉發表於《中央公論》。9月，〈田園的憂鬱〉發表於《中外》。12月，第一本短篇集《生病的薔薇》由天佑社發行。

1919年（大正8）

2月，第二本短篇集《絹與其兄弟》由新潮社發行。6月，定本《田園的憂鬱》由新潮社發行。

1920年（大正9）

2月，因為極度精神衰弱而回到故鄉療養。6月，接受中學同窗東熙市的邀約，前往台閩旅行三個月。10月，從台灣返日，和米谷香代子分手。

1921年（大正10）

5月，與谷崎潤一郎斷絕友情關係。7月，首部詩集《殉情詩集》由新潮社發行。

1922年（大正11）

3月，61歲的父親豐太郎將新宮家中的戶主地位讓給春夫繼承。4月，《南方紀行》由新潮社發行。12月，預定前往中國旅行半年。

1923年（大正12）

1月，《都會的憂鬱》由新潮社發行。因為弟弟秋雄入院，中國旅行延期。2月，詩文集《我的一九二二年》由新潮社發行。

1924年（大正13）

3月，與小田中タミ結婚。

1925年（大正14）

2月，移居於東京都小石川區（現在的文京區）。

1926年（大正15、昭和1）

2月，《佐藤春夫詩集》、《女誠扇綺譚》由第一書房發行。9月，《蝗蟲的大旅行》由改造社發行。

1927年（昭和2）

7月，接受田漢邀請，與妻子千代和姪智惠子一同前往中國旅行。8月，返回日本。

1928年（昭和3）

7月，《文藝一夕話》由改造社發行。10月，《厭世家的生日》由岩波書店發行。12月，《田園的憂鬱 都會的憂鬱》由新潮社發行。

1929年（昭和4）

1月，《支那童話集》由アルス發行。9月，《車塵及》由武野藏書院發行。

1930 年（昭和 5）

6 月，與小田中夕ミ離婚。8 月，佐藤春夫、和谷崎潤一郎、千代三人聯名在《朝日新聞》上發表公開信：谷崎潤一郎與千代離婚、孩子鮎子和母親一同生活、千代與佐藤春夫結婚，這就是著名的「讓妻事件」。9 月，《更生記》由新潮社發行。

1931 年（昭和 6）

10 月，《魔女》由以士帖印社發行。

1932 年（昭和 7）

10 月，長男方哉出生。

1933 年（昭和 8）

9 月，《維納的殺人嫌疑犯》由小山書店發行。

1934 年（昭和 9）

7 月，隨筆集《閒話半日》由白水社發行。

1935 年（昭和 10）

5 月，與增田涉共譯《魯迅選集》由岩波書店發行。10 月，《我的成長》由新小說社發行。

1936 年（昭和 11）

1 月，《掬水譚》由大東出版社發行。7 月，《霧社》由昭森社發行。

1937 年（昭和 12）

1 月，成為《日本浪漫派》同志。11 月，《鼯鼠的冊子》由人文書院發行。

1938 年（昭和 13）

5 月，以文藝春秋社特派員的身分前往中國，在北京停留至 6 月初，經由當時留學中國的竹內好之介紹，認識周作人。9 月，以從軍記者的身分再度前往中國，10 月歸國。

1939 年（昭和 14）

2 月，《戰線詩集》由新潮社發行。

1940 年（昭和 15）

7 月，《支那文學選》由新潮社發行。認識島田謹二。

1941 年（昭和 16）

10 月，弟弟秋雄去世。《支那雜記》由大道書房發行。

1942 年（昭和 17）

3 月，父親豐一郎過世，享年 81 歲。5 月，《日本頌歌》由櫻井書店發行。12 月，《慵齋雜記》由千歲書房發行。

1943 年（昭和 18）

11 月，以從軍作家的身分，前往馬來、爪哇視察旅行。

1944 年（昭和 19）

1 月，至峇里島視察。5 月，從南方返國。6 月，《西遊記》由新潮社發行。

1945 年（昭和 20）

4 月，移住至長野縣北佐久郡平根村，以後五年間都居住於此。

1946 年（昭和 21）

9 月，詩集《佐久的草笛》由東京出版社發行。10 月，《日本文藝之道》由新潮社發行。

1947 年（昭和 22）

9 月，《美麗的城市》由細川書店發行。12 月，《荷風雜觀》由國立書院發行。

1948 年（昭和 23）

8 月，《青春期的自畫像》由共立書房發行。成為藝術院會員。

1949 年（昭和 24）

6 月，《抒情新集》由好學社發行。

1950 年（昭和 25）

1 月，《築夢的人們》由岩谷書店發行。

1951 年（昭和 26）

2 月，《平妖傳》上卷，由世紀書房發行。2 月，《平妖傳》下卷，由世紀書房發行。

1952 年（昭和 27）

3月，《近代神仙譚》由乾元社發行。

1953年（昭和28）

1月，《佐藤春夫全詩集》獲得第4回讀賣文學賞。

1954年（昭和29）

8月，《我的小說作法》由新潮社發行。11月，《改訂近代日本文學的展望》由河出書房發行。

1955年（昭和30）

1月，《晶子曼陀羅》獲得第6回讀賣文學賞小說獎。9月，《悲壯美的世界》由講談社發行。

1956年（昭和31）

10月，《自選佐藤春夫全集》（全10卷）由河出書房發行，至1958年全部發行。

1957年（昭和32）

6月，《釋迦堂物語》由平凡社發行。

1958年（昭和33）

6月，《淘氣時代》由講談社發行。12月，《日本的誕生》由河出書房新社發行。

1959年（昭和34）

7月，《日本的風景》由新潮社發行。9月，《我的龍之介像》由有信堂發行。

1960年（昭和35）

5月，《小說永井荷風傳》由新潮社發行。11月，接受文化勳章。

1961年（昭和36）

5月，《望鄉之賦》由修道社發行。

1962年（昭和37）

4月，《晶子曼陀羅》由角川書店發行。7月，《美的世界》由朝日新聞社發行。

1963年（昭和38）

8月，《詩文半世紀》由讀賣新聞社發行。9月，《美女日本史》由河出書房新社發行，《愛的世界》由朝日新聞社發行。11月，《佐藤春夫文藝論集》由創思社發行。

1964年（昭和39）

5月6日，在關口町自宅錄音中，因心肌梗塞驟逝。

註：本年譜係參考下列書目製成

〈年譜・著作年表〉，《定本佐藤春夫全集》（別卷1），京都市：臨川書店，1999～2000年，頁263-386。

中村光夫，〈年譜〉，《佐藤春夫論》，東京：文藝春秋社，1962年，頁214-228。

福田清人編，岡田純也著，〈年譜〉，《佐藤春夫》，東京都：清水書院，1988年第3刷，頁197-205。

